



東方考古研究通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第九期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
Ori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

白云翔 陈星灿 方 辉 宫本一夫 靳桂云
栾丰实 佟佩华 王 青 文德安 赵 辉

主 编：方 辉

封面设计：韩小囡

本期编辑：陈淑卿 黄苑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

E-mail: arc@sdu.edu.cn

网址: www.arc.sdu.edu.cn

电话: 0531-88362904/88366149

传真: 0531-88565268

目 录

刘敦愿先生纪念专栏

-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纪念刘敦愿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顺利召开…………… (1)
- 刘敦愿先生传略…………… (4)
- 回忆父亲刘敦愿先生…………… (12)
- 考古学家刘敦愿的遗产…………… (18)
- 刘敦愿先生著作目录…………… (20)

考古发现与研究

- 中美联合考古队结束在鲁东南地区的考古调查…………… 乔卓俊 (25)
- 我校考古队在河南发现龙山文化城址…………… 王青、王良智 (25)
-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器兵器及相关问题…………… 马强 (27)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学术活动 (2007. 7~2007. 12)

- 06 级研究生赵敏参加 2007 吉林大学考古学术论坛…………… (34)
-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栾丰实教授等赴日本参加“山东半岛地区稻作农业及其东传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 (34)
-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靳桂云教授赴波兰参加国际环境考古年会…………… (35)
- 山大环境考古学科获国家“111 计划”资助…………… (35)
-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匡悌先生来我校访学…………… (36)
- 方辉教授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7)
- 王青教授参加河南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庆典暨两周列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38)
- 王青教授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39)
- 栾丰实教授参加“环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时期古文化学术研讨会”…………… (39)

CONTESTS

Memorial Column of Mr.Liu Dunyuan

Art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s: a Commemorat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Mr. Liu's Death hold successfully	(1)
Biographies of Liu Dunyuan.....	(4)
Recalled father	(12)
The Archaeologist Mr. Liu's Heritage	(18)
Catalogue of the Works of Professor Liu Dunyuan.....	(20)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Sino-American Archaeology Team Ended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Shandong Easten-South Area	Qiao Zhuojun (25)
A Archaeology Tea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Finds a Longshan City in Henan	Wang Qing, Wang Liangzhi (25)
Bronze Weapon Vessel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Ganquan Country, Shaanxi,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	Ma Qiang (27)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Centure (2007.7~2007.12)

06 Ma Zhaomin Attended the Academic Forum in Jilin University	(34)
Professor Luan Fengshi Attended the <i>Academic Seminar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Rice Agricultural and Transition of Shandong Peninsula</i> in Japan	(34)
Professor Jin Guiyun Attended the <i>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ical AnnualConference</i>	(35)
The Discipline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Gained the Financial Aid of Nationa "111 Programs"	(35)
Mr. Li Kuangti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aiwan Central Institute Visited Shandong University	(36)
Professor Fang Hui was Selected as <i>the Excellent Talents Supportion Plan in the New Century</i>	(37)
Professor Wang Qing Attended the 80 th Anniversary of Hennan Museum --the Academic Seminar of Zhou Dynasties Culture	(38)
Professor Wang Qing Gained the <i>Third Prize of Field Archaeology</i> of State Cultural Relics Bureau	(39)
Professor Luan Fengshi Attended the <i>Academic Forum of Cultures of Majiabang Period in Northwest of Cyclo-Taihu Lake</i>	(39)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纪念刘敦愿先生逝世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顺利召开

为纪念著名考古学家、我国美术考古研究早期的开拓者刘敦愿教授逝世十周年，庆祝刘敦愿先生《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大陆版）出版发行，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办的“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纪念刘敦愿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7年8月25日在泉城济南召开。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民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和山东大学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主持，主要围绕刘先生的治学思想与学术贡献展开讨论，分为《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简体字版）首发式、主题发言、学术动态交流等三个议程。会议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美术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当代考古学的主要成果及学科发展趋势、学术交流的方式和对年轻学者的培养等问题。

刘敦愿先生生于1918年，早年从事绘画创作，后来受丁山、吴金鼎等先生的指导和影响而转入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先生博学多闻，才思敏捷，又勤于笔耕，所以其著述甚丰，致广大而尽精微。《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文集是由先生的百余篇论文中选出的四十五篇所组成，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和以考古发现为主的造型艺术的探索两个方面。1991年曾在台湾由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但因印数较少，大陆学界难得一见。简体字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为大陆美术考古研究提供了方便。首发式由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主持，首发式上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赠书仪式的主要对象为科研机构 and 高校图书馆。

山东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教授乔幼梅女士、考古系主任于海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许宏研究员、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处由少平处长、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佟佩华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毕斐教授以及刘先生三子刘陶先生等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刘敦愿先生有教无类、诚者自成的教学风范，严谨求实、厚积薄发的治学作风，追求学术、捍卫学术的探索精神，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刘先生作为考古学家的远见卓识和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

在学术动态交流议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研究员作了题为《从宫殿建筑说三代文化关系》的学术报告，结合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总结了夏商周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化过程，指出夏商宫殿建筑布局为“密联式”组合的中原模式，而周代宫殿为“散点式”组合的西土模式。这一见解，为王国维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故夏、殷间政治

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等论断提供了绝好的考古证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的车广锦教授和四川美术学院的倪志云教授在深入分析刘先生关于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关系的基础上，对美术考古的基本含义、研究对象以及学术定位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向、研究风格和研究层次。其“特殊性”在于，它是考古学与美术史之间跨学科性质的一个交叉领域。在研究对象上，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主要的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各种具有美术性质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以及传世品和流散文物中的艺术品。在研究方法上，除采用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法之外，还应参照美术史的形式与内涵的分析等方法，在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含义做出了持之有效的解释的前提下，就可以从其含义，以及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人类思想、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的联系上，从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风格及其与特定的艺术传统的联系上，对古代社会文化作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美术考古研究的目标，在探讨它们所能反映的古代社会文化的相关方面之外，至少还应包括研究美术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方面。正像考古学也大大扩大了传统史学的视野，使人类对于历史的了解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一样，美术考古研究也大大扩展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使人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状态开始来认知美术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方法论和具体研究的层次上说，美术考古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年代学和类型学等方面的研究、对艺术品的含义的分析研究和综合研究，其中含义的考释这一个层面的研究是美术考古的支点性研究。因此，美术考古研究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既具有考古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美术研究的基本素养和能力。两位学者对刘先生学术传统的弘扬，也为这一领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意见。

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清泉教授在其《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从宣化辽墓看中古丧葬观念的一次转变》的报告中，以宣化张氏墓地的埋葬方式为例，指出火葬墓在辽墓中占有很大比重，其产生、发展和盛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要是受佛教信仰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真容骨灰葬，棺内葬有木雕偶像，头部的雕制技法力求对自然形态的模仿，应该为真容木雕像。这种葬俗起源于唐代，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中国传统葬俗的结合。辽代墓葬在早期以圆形或方形多室墓为多，辽道宗清宁以后，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单室墓并日益盛行。究其原因，应与当时密教信仰有关。瑜伽密教对“八大菩萨”、“八大灵塔”的崇拜首先影响了用于埋葬佛陀的舍利、作为佛教象征建筑的塔。在佛教中国化后，与中国历代建筑地下墓室的习俗相结合，舍利子也开始被置于塔基下面的“地宫”，其平面形状基本和塔基是一样的。作为同样是埋藏尸骨的墓室，其平面完全有可能模仿佛塔的地宫建制。因此众多的辽地佛教信徒便开始模仿建造形似佛塔八角形地宫的墓葬，从而引发了中古时期丧葬观念的一次大转变。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题为《北周康业墓画像札记》的发言对西安北郊炕底寨村西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康业墓屏风画像做了重点分析，并将之与同一历史时期其它同类画像作对比研究，如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1977年洛阳北邙山出土石榻上的画像和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所藏北魏孝子画像棺、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所藏北

魏正光五年（524年）赵郡贞景王元谧石棺，以及同时期的维摩变相等，发现此类画像尽管主题内容涉及世俗、佛教、儒学、玄学、道教等各个领域，但在构图形式上有着极强的相似性。进而提出一系列思考，如在形式背后有没有观念上的联系？不同区域的艺术有什么关系？艺术形式的选择与政治、文化的取向有何关联？墓葬画像与墓主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深思。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从军教授作了题为《两汉铜镜图像解读》的学术报告，指出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铜镜图案及其象征意义的演变过程，即西汉早期铜镜图像——从天体到太阳，西汉中期铜镜图像——光明的渲染，西汉晚期铜镜图像——辟邪与永恒，东汉中期铜镜图像——宜官宜侯，东汉晚期铜镜图像——神仙世界，并分析了这一演变过程的深刻社会背景。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方辉教授以《东周时期的刻纹铜器》为题，就刻纹铜器的性质和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刻纹铜器几乎全为盘、匜一类的水器或所谓异形器，器物极薄，应非实用之器；刻纹图案多表现鬼怪（尤多见水怪），应即所谓“畏兽图”；多见于苑囿之中，涉猎内容常见。在古代，水属阴，代表死亡；苑囿则是鬼神出没之地。与此类刻纹铜器伴出的通常有鎏金器皿、熏炉、陶俑和朱砂，而这些都与早期道家关系紧密。因此，此类刻纹铜器是一种与早期道家和方术有关的器物，其使用者也可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方士一类人物。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之外，刘敦愿先生在农业考古、考古学与科技史领域也颇有建树。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历来重视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考古发掘中注重收集动植物遗存以便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与美国学者合作开展全方位聚落考古，其中动植物遗存研究居重要地位；考古中心成立的内容之一就是建立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因此在会议的最后议程中，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环境考古研究室主任靳桂云教授介绍了山东大学第四纪环境与考古研究的学术背景、实验室概况、研究内容和成果。第四纪环境与考古研究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科定位的主要方向，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实验室目前基本设备齐全，人员构成合理，承担着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概况、海岱地区稻作农业研究、文明探源预研究；王城岗遗址植硅体研究、文明探源；黄河下游地区岳石文化到商代农业研究以及南水北调工程中植物考古研究、日照地区中全新世环境与人类关系等多项科研任务，在动物驯化与饲养、石器制作工艺方面也取得初步进展。

本次纪念刘敦愿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后考古学学科发展势必将有促进作用。以此为契机，今后更应强调多学科的合作，强调理论探索与方法论的改进，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发掘刘敦愿先生的教学理念，弘扬刘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并为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对话的平台，与会专家学者彼此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深感获益匪浅。本次研讨会受到大家高度关注与热情支持，与会学者对会议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淑卿）

刘敦愿先生传略

于海广、方辉、郑岩、周洪、栾丰实、倪志云

—

刘敦愿教授 1918 年 6 月 24 日生于湖北汉阳。其曾祖父刘淑云是清道光年间国子监祭酒,其父刘人劭先生是一位铁路职员,曾参加同盟会,先生幼时,良好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好学的品质,先生于 1932 年毕业于郑州铁道部小学,1938 年毕业于郑州扶轮中学。

先生自幼喜爱绘画,曾梦想成为一名画家。1939 年先生在昆明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该校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平与杭州两所艺专合并而成的。当时,毕业于清学大学外语系并留学法国的秦宣夫教授在校任教,先生随他学习素描,同时受其影响,开始从古代艺术的角度接触到考古学知识。战时的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常常难以买到必需的绘画颜料,但通过勤奋的学习,先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绘画基础,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深受其益。

从先生遗留的少数早年的绘画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艺术方面天资丰厚富于才华。但先生个人认为自己的气质与秉赋更适合冷静地思考学术问题,因此逐渐对艺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先生沉醉于埃及法老的雕刻、巴特农神庙的建筑之类西方古代艺术,曾认真研读米海里司(A. Michaelis)《美术考古一世纪》、格罗塞(E. Grose)《艺术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此类资料极不易得,所以又转向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当时艺专在四川巴县磐溪,中央大学则迁于重庆沙坪坝,两校隔江相对。这期间,先生便定期渡江去旁听中大历史系著名古文学家丁山教授讲授的《商周史》与《史学名著选读》,以期为日后美术史的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先生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风雨无阻,其认真的学习态度深得丁山教授嘉许。丁山教授认为先秦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关键,先生遵师训而力行,对于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目标来说,他开始步入一条最为艰辛,也最扎实有效的道路。

1944 年,先生于国立艺专毕业后,曾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还担任过小学教员。1945 年,先生曾在迁居成都的齐鲁大学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听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讲授《田野考古学》,开始学习考古学的基础知识。1947 年,经丁山教授推荐,先生受聘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历史文选》等课程,同时协助丁山教授的研究工作。1952 年,先生服从组织安排,在解放军驻镇江某部担任了一年文化教员,在青岛期间,还兼任过中学的美术课。

1953 年 5 月,先生从山大中文系转入历史系任教,随即赶赴洛阳参加浍沟汉墓的发掘。从此,先生便开始了考古学的调查与研究。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先生先后调查了日照、五莲、即墨、临沂、胶县多处早期遗址。同时发表了有关山东龙山文化研究的几篇论文。

“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先生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家庭也受到了冲击。他仍利用晚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不少资料。1972 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建,先生出任教研室主任,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泗水尹家城、日照东海峪、临淄齐故城等遗址的发掘。先生 1972 年发表的《汉画像石

上的针炙图》一文,成为“文革”后期山东大学文科专业中发表的第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文革”结束后,先生更加勤奋地从事教学与科研。1979年,先生出席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80年代是先生著述的高峰期,发表文章达60余篇。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史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博物馆学会顾问等职。还积极参与、倡导工艺美术、农业考古、民俗学与民间艺术等相关学科的研究。1982年,先生开始招收考古硕士研究生,成为山东大学考古学硕士点的奠基人。

先生晚年仍笔耕不辍,除了审慎严肃的学术论述外,还写作了一些文笔清新、深入浅出的普及性的短文,以提倡、扩大学术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1994年,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先生的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收入论文45篇,基本反映了先生治学的主要成就与特点,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好评。1996年,先生还完成了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齐乘》一书的校注。

1996年5月,先生因病住院。9月,病情略见好转,便伏案写作,终因过度劳累,于11月再次入院。1997年1月15日晨,先生因肺心病抢救无效,逝世于济南,终年79岁。

二

刘敦愿先生的学术研究以美术考古的成果最为卓著,先后发表的这方面专题论文达40余篇,涉及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器装饰艺术、战国青铜器画像、汉代绘画艺术,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古代美术若干具体特点及相关艺术观念、艺术理论等问题的探索。

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早在宋代已成为金石学的重要内容,但金石学所关注的主要是金石载体上的文字,对于商周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仅仅根据零星的文献资料,便提出一些包含释意味的定名,例如“饕餮纹”、“窃曲纹”等,这些名称曾长期沿用。本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被作为器物形制划分与断代的一方面依据而受到关注,但对于其艺术本身及纹样母题含义的探索却长期是一个薄弱环节。研究青铜器装饰艺术是先生早年的愿望,经过数十年的长期积累,终于在其晚年得以具体化为系统的学术实践,并取得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

先生所著《〈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一文,摆脱了宋人依据《吕氏春秋》只言片语对青铜器“兽面纹”作出的“象饕餮以戒其贪”的旧说的拘限,指出形式变化极多的各种兽面纹样,主要是羊、牛、龙、虎、鹿等几种动物的正面头像。这些纹样起源古远,与原始宗教中的神灵崇拜有关,应是各部族崇奉的保护神,它们是善灵,而不是恶煞。另一方面,兽面纹盛行的时代,正是从史前到文明,从部落到国家,战争频繁而剧烈的时代。那时的王、侯、卿、大夫率多是军事统帅与将领,广大的士阶层也都是武士而非文士。因此难以想像,作为国家“重器”的鼎彝以及战争用具的甲冑之上,会铸上因“食人”而遭到报应的“饕餮”纹样“以戒其贪”。恰恰相反,他们最乐于显示勇武,炫耀胜利,各种兽面的正面形象,塑造了动物处于争斗状态的特征,正是要象征各自部族保护神的威猛勇敢的精神。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梟类题材研究》一文认为,在后世被视为丑恶的不祥之鸟的梟类,在商周铜器至汉代绘画艺术中大量存在,显然是受到崇拜和赞美的对象,属于夜禽的梟类应是被视为夜与梦之神而受到尊崇、获得生动的艺术表现的。

《中国古俗所见关于虎的崇拜》一文，论述古代虎的艺术形象象征威猛，具有辟邪厌胜性质；虎的艺术形象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在农业中虎与野猪的天敌关系及其与八蜡报祭活动的联系；在五形观念中，虎的形象又被融会到农业之神、秋季之神以及刑神崇拜中。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中的牛纹与牛尊》一文，引据民族学资料，论证青铜艺术中牛的形象是财富的象征。《论湘潭商代豕尊》一文，论证湘潭豕尊并非前人所论定的野猪造型，而是雄性的家猪形象，反映了古代祭祀用豕的宗教习俗。

先生有关青铜器动物纹饰的论述，还包括鹿、蝉、鹰、貔、鸡等。此外，还对于一些十分抽象的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表现对象及其含义作了精辟的解析。

《青铜器勾连纹探源》一文，既据考古资料论证青铜器勾连纹是对华美的竹类编织纹的模仿，又据文献资料推论竹类编织及青铜器勾连纹，都是尊贵地位的象征。《圆涡纹与〈考工记〉的“火以圆”》一文，对已有的圆涡纹象征雷电之说以及以太阳的形象象征火之说加以商榷，提出圆涡是以钻木取火的符号抽象化的造型为火的象征的新假说。

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中国青铜艺术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大量的以写实风格的绘画作为装饰图案的作品。先生特别重视对这类青铜器的研究，在《关于战国青铜器画像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先生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了这类装饰图案的特征，提出了“青铜器画像”的概念，批评了三四十年代曾风行一时的斯基泰文化影响说。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先生对青铜器画像的题材作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其中《青铜器上的采桑图像》一文，由对图像中采桑女子遍知罗绮，又有佩剑的男子杂厕其间等细节的观察，指出这一题材并非如旧说是表现采桑劳动，而是表现了贵族青年男女桑间濮上的春游欢会活动，是与社祭相关的一种古老的风俗。这一解释使得该细节的主题与画面中的其他内容皆为贵族生活与好尚的情况统一起来，是极有说服力的。

汉代绘画艺术也是先生研究的重点之一。《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一文，与一般认为帛画表现的是天上、人间与地下的神话图景的阐释不同，通过对龙蛇与地母崇拜、“九阳”与阴间神话、鸱鸢与长夜（死亡）的关系等具体分析，提出了帛画“主要描写的是地府的情景，以地母神话为主体，兼及治水神话”这样一种独特而论据充分的观点。

《汉画像石中的外灸图》一文，认为汉画像石中半人半鸟形医者为人切脉针灸的画像是对于神医扁鹊故事的描绘。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未详历史故事考释》一文，将一批原未认定表现内容的画像考证为“晋献公杀太子申生”、“楚人献鬻于郑灵公”、“豫让刺赵襄子”等历史故事的描绘，其他如论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黑地彩绘图像，论河北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图像，论汉画像石中的庖厨题材、蹴鞠图、秣马图及祭祀歌舞图等，也都通过细致的观察与坚实的论据，得出新颖的见解，推进了对诸类问题的研究深度。

先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还从多个角度综合观察商周秦汉的造型艺术，写出《中国早期雕刻艺术及其特点》、《商周时期的象形文字、纹样与绘画的关系》、《论述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中的细节表现》、《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论青铜器动物纹饰的对称法则问题》、《天圆地方思想的起源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等论文，涉及中国古代美术某些方面、某

些时期的艺术特点及其相关的艺术观念与文化背景等诸多问题。而《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一文则从宏观上讨论了考古资料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问题，且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先生的论述给予人们突出的印象是，他非常熟悉古代文献，不仅先秦典籍，而且下及两汉、魏、晋、唐、宋的史籍，以至于笔记杂著，往往成为他阐释古代遗址遗物、讨论有关历史学问题的论据。先生选用文献资料，有着独特的视角，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因而往往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如《考工记·梓人为筍虞》篇是一篇非常系统的有关雕刻装饰的理论文献，在先秦时期极为罕见，先生对照考古发现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释证。这一研究，是对古代文献的重新认识与发掘。而先生对于兽面纹误定为“饕餮”的质疑，又表现出对待文献资料所持的辨析与批评的理性态度。

先生认为，美术考古学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突出的科研领域，要搞美术考古的研究必须既具备考古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备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出身考古专业、仅仅对美术有欣赏的兴趣而未曾有过美术技能训练的人，或出身于美术专业，仅仅对考古发现有好奇心而未曾学习考古专业知识及技能的人，都难以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古代艺术品，只能“泛泛地引用一些套话，只能作赞美而不能作分析，不能显示某些重要发现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既不能说明它的成就，同时也指不出它的局限。”（《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读先生的著述，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其艺术秉赋和绘画实践经验的影响。《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一文写于50年代末，当时学者们尚未对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艺术价值有足够的认识，该文就陶器的造型、色泽、厚度、装饰方法、纹样母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谈到蛋壳黑陶因过分追求精美，违反了陶土的性能而被后代淘汰，后来还谈到大汶口文化模仿编织物的镂空器座也因同样的缘故而昙花一现。在《战国铜鉴上的庭院植树与观赏养鹤》一文中，将平视的“射猎”图像作俯视的“可能情况之设想”，因而提出松林与鹤是举行竞射活动的庭院中的景物。如此等等，如不具备深厚的美术修养，是难以作出这般独到的分析和推断的。

先生对于艺术问题的论述，并不因为形象思维所具有的跳跃性而漫无边际的“跑野马”，他敏锐地观察所得，总是诉诸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每每把古代艺术品同特定的社会土壤与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经过反复论证，力求其是，这一点正是许多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的。《中国早期的雕刻艺术及其特点》一文从宏观上研究上古雕刻艺术的特点，指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的不平衡，雕刻未得到充分发展，进而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上古宗教仪式质朴简单，未曾使用偶像，因此而形成一种历史传统，制约了雕刻的发展。这篇文章从构思到发表，历时二十年，是建立在对考古资料的全面考察和长期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颇受一些美术史家的赞同。

另外，先生早年学习西画，对于西方美术史具有较系统的知识，这一方面的素养，也使他在致力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时，视野并不局限于中国，在观察分析问题，即使不常行于文字，也往往将西方美术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即把所提出的有关论说置于世界美术史的大背景下，也不失为允当之论。

先生对于美术考古的研究，有些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而得出的不易之论，具有经典性，有的则发前人之未发，自成一家之言，具有原创性，通过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更为可贵的，是以其独到的方法和审慎的态度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道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发扬。

三

先生年青时代怀着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抱负而步及考古学领域。在他的眼里,这片新的天地不是只有破陶断瓦、满身尘土,而是充满了希望与色彩。1953年,当他第一次赴洛阳参加发掘时,就表现出无比的兴奋与激动,这期间,他的日记往往每日写下十数页,详细记载工地的发现和有关的知识。他用最纯最浓的色彩在日记本上画下了所见遗址的速写,封面上题以“美丽的一九五三年”。先生第三个儿子出世时,他刚从外地调查归来,为之取名“陶”。以纪念自己新的收获,弄璋之喜,名之以瓦,同样表现出他对这一事业的热爱。

1954年,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第一次开设《考古学通论》的课程,通过实践发掘和课堂教学,先生深感第一手科学资料和文物标本之不足。囿于当时的条件,进行田野发掘是不可能的,而比较现实的就是开展地面考古调查工作。自1953年实地调查章丘城子崖遗址开始,先生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带上三两个热爱考古的学生,利用节假日奔波于田野之中。数十年间,先生先后调查了日照两城镇,王莲丹土,青岛霸王台、古镇和古城顶,即墨北阁,临沂土城、毛官庄、援驾墩、重沟、护台和石埠等,滕州岗土,宫庄和后堆,曲阜西夏侯,泰安大汶口,胶县三里河,章丘城子崖、平陵城,济南甸柳庄、大辛庄,足迹遍及山东各地,先生虚心好问,平易近人,在调查中结识了不少农村的朋友,有的多年与先生保持着联系,每有重要遗物出土时,总要来信相告,或径直将出土品赠与山东大学收藏。如山东省博物馆所藏出自日照两城镇遗址的著名兽面纹玉圭(原称玉簪)和山东大学收藏的其他玉器,一部分就是这么得来的。说起两城镇出土的兽面纹玉圭,有的学者曾认为其年代有疑问,以致稿件在编辑部压了很长时间未能发表,先生独具慧眼,坚持认为其属于龙山文化。尽管限于刊物的体例,先生当时富有创见的论述已被删掉,但玉圭发表之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引用频率最高的考古文献之一。

同时,它使许多清宫旧藏和流散于海外的类似玉器因此而找到了文化归属,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龙山时代精神文化的认识,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值得提及的还有三里河遗址的发现。1961年,先生根据韩连琪教授提供的线索,由清人所摹高凤翰一幅画作中的陶图像,按图索骥,亲自前往胶县三里河实地调查,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表现出严谨求实、乐于实践的精神,长期以来在考古界传为佳话。

第一手的考古资料是进行考古研究的必要条件,因此,尽快地将已有的资料发表出来,是促进考古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在资料十分匮乏的50年代尤其如此。先生身体力行,总是把自己的调查所得及时整理公布。如1955年、1957年调查的日照两城镇遗址,资料发表于《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1957年调查的滕县岗上等遗址,资料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1957年调查的五莲丹土等遗址,资料发表于《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并且,这些资料从陶片的洗刷、拼对、修复到绘图、拍照,都是由先生一手完成的,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这些调查资料,尽管已经过去了40年,有的仍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山东五莲、即墨两处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等,迄今仍是研究东部海滨地区龙山文化的重要资料。

先生从50年代开始,断续有考古研究文章发表,先生考古研究的特色是,或把相关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进而探讨历史问题,或从艺术的角度对考古遗存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和实践着一条

重要的研究思路。前者代表性的论文有《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山东宁阳堡头大汶口墓地和有虞氏关系问题的探索》、《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等;后者代表性的论文有《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岳石文化的陶器艺术》等。其中《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一文,在对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文献中的古史传说资料,结合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提出典型龙山文化就是风姓东夷族的文化。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曾得到顾颉刚、夏鼐等先生的赞同和肯定。在 50 年代,先生为了深入研究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还由宋百川陪同专门去即墨县西城汇现代制陶作坊,对现代手工制陶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实地考察,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史前研究为开端,先生还撰写了部分有关历史时代考古学与史学研究的文章。《扁鹊名号问题浅议》一文,发现《史记·扁鹊苍公列传》对扁鹊记载前后矛盾,可能是一部未定之稿。在《史记》中扁鹊似是名医秦越人的私名,而在有的文献中,又被信为是黄帝时人,先生进而认为扁鹊应是善医之族的族名,可能是少昊氏系统以外山东地区崇拜鸟的史前部落或氏族,并以此与汉画像石的图像资料互相印证,凿凿有据,可谓定论。《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则以 60 年代对齐国故城遗址的钻探资料为基础,辅以文献典籍的记载对其进行复原研究,这一成果对于该遗址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具有指导价值,对于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项研究在先生晚年所作的《齐乘校注》(待出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

先生的考古学与史学研究虽以东夷地区和齐鲁文化为重点,但又不囿于地域的限制。《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一文,从发生在云梦泽的两个古代传说所折射出的史影入手,分析认为周公践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实为历史上一次大的民族迁徙运动,并结合实物资料考察了商代虎方的迁移路线,又兼及犀族与百濮的历史,勾画出商周之际以云梦泽为中心自东方通往西南地区的一条民族迁徙的通道,深受学术界肯定。

先生早年作为丁山教授的助手,曾为丁山先生《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的写作做过许多辅助工作,先生后来的研究也深受该书的影响,有不少涉及古代神话的论述,如《舜与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从夔典乐到夔魍魎》、《干将莫邪铸剑神话故事试析》等都是这类富有独到见解、充满新意的佳作。与之相关,还有一些论文则涉及古代国族史问题,如《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解》一文就是此类的代表作。《国语》记周穆王西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旧解认为是犬戎进贡珍稀动物,历史学家对此无异议。该文则指出,这次民族征伐以大临小、以强凌弱,必有所获,所谓“得四白狼、四白鹿”应是周穆王在战争中迫迁或系虏了犬戎的白狼和白鹿两个胞族,与文献所见轩辕氏“教熊、罴、貔、豸、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周公践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等等是同一性质的问题。该文援引文献和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车饰上的披发文身人像来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过狼图腾与鹿图腾的氏族,其结论极有说服力。

先生治学功力深厚,视野宽广,主张从多个角度来认识考古学资料,他认为地下丰富的实物资料经过科学的发掘、编排详明的报告之后,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进行“再发掘”。他凭借广博的知识基础,所论问题往往延伸到相关的其他学科,这样的论述虽数量并不太多,但由于视角独特,每每发他人之未发,极富启发性。

先生曾披览大量唐宋以降的笔记小说,沙里淘金,从中发现过许多有关古代风俗的史料,并据此

写作了一些有关古代风俗的文章,其中如《中国古代文身遗俗考》、《试论中国风筝之始见与始作问题》等,巧妙地利用晚期的“边角”史料,并在先秦两汉经典中追本求源,钩沉探微,总结古代风俗的传承关系,从而提示出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色。

先生在古代艺术研究中,特别重视引征民族学材料或当今民间艺术的材料作为旁证;反过来,他认为当今民间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许多古代艺术的流风马牛不相及余韵。《民间工艺美术与青铜器装饰造型构思问题》、《神圣的肠道》等论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先生曾担任中国农史学会顾问,积极提倡和参与对古代农业的研究。他早年所著《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畜牧业的作用》和后来所写的《中国古代的养猪业——兼论农牧结合问题》、《我国舍饲养猪的起源问题》、《中国古代有关农业的“孕育仪式”及其他》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先生多次强调在黄河流域农业、畜牧业并重发展的学术思想,成为研究古代农牧史的重要文献。先生通过探讨青铜器中动物纹样的含义等问题,转而检讨古人对于动物的认识、利用以及与古代环境的关系。如《中国古代有关泉类的好恶观及其演变》、《中国古代的鹿类资源及其利用》等可视为青铜器纹样有关论文的副产品或姊妹篇。同类的文章较重要的还有《中国古代对于蛙类的食用和观察》、《中国古代的食用昆虫及有关问题》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生有时在不同性质的文章中引述同一资料,而提示的问题又全然不同。如对于云南江川李家山一件青铜臂甲上的动物纹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它反映了古代艺术对于时间与运动特殊表现手法。而另一篇文章又从中观察到了古人对于生物学中“食物链”的认识。这些耐人寻味的发现可能引导我们更加细致地观察研究地下出土的古代遗存。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与发展,考古材料将日益得到多方位、多层面的认识,未来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必将会有更多的选择与取向。跨越学科的界限,对田野资料进行多方面的归纳阐释,也将成为许多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可以相信,先生的上述求索将会随着学科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

四

刘敦愿先生在山东大学执教长达四十年。他一贯重视古代史与考古学的教学工作,奖掖后进,诲人不倦。他是山东大学考古系和考古学硕士点的奠基人。1972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之初,百业待兴,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考古专业只有两名教师,困难重重,先生为组织教学,商调教师四处奔波。第一届学生入学后,先生先后从北京、河南、江苏及省内有关单位聘请人员为学生开课。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资队伍。

虽然先生个人的研究志趣在于美术考古方面,但他却始终认为田野实践是重中之重。为考古专业的发展设定了正确的方向。先生特别注重对青年教师培养,强调他们必须过好田野发掘这一关,他多次用“飞行员飞行小时”的生动比喻启发引导青年教师重视发掘水平的提高。先生对每届学生的实习、参观非常重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要亲自参加,做出表率。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在田野考古教学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田野考古实践》课程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发掘成果先后三项被列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同时积累了大批实物资料,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先生历来重视资料的积累。山东大学自曲阜回迁济南时,各类书籍、文物、档案临时存放在一起,先生反复告诫大家在整理时只字片纸也不可丢弃。兄弟单位的赠书,

只要先生经手,都很认真地记上所赠单位和时间,并要分管同志回信致谢,保持联系。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逝世后,先生经过努力,征得郭老家属同意,将其藏书捐赠山东大学,奠定了考古资料室藏书的基础。先生晚年谈及身后之事,多次嘱托家人要将个人的藏书捐献山东大学考古资料室,以泽惠后学。

初创时期的考古专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规的陈列室,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先生对此十分焦急。经过多次向组织呼吁、申请,终于在1984年从校图书馆争取到一间140余平方米房间作陈列室,先生为此特别兴奋,亲自设计陈列、制定计划。至1995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博物馆建立,文物陈列成为其主体内容,为教学和科研发挥了很大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先生这时已病体虚弱,竟未及亲眼看到自己久已向往的博物馆。先生还曾构想在山大创办一份专业刊物,使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得到尽快发表,即使在病重期间仍将其记挂心间,多次嘱托考古系的同志要办好此事。

先生晚年曾说:“人如果有来世,可以再选择一次,我还要作一名教书匠。”先生在山东大学执教四十年,曾开设过十几门课程。先生备课十分认真,讲解时总能把深奥的内容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极受同学们欢迎。先生讲授《美术考古专题》,总是从自己确有心得的研究谈起,而不去拾人牙慧。他喜欢讲《考古学史》,往往借题发挥,从自己年轻时所见所闻来鼓励同学们对考古学事业的热爱。先生指导学生,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与爱好确定主攻方向,不让学生“穿着老师的鞋子走路”。曾有一位研究生写了一篇短文,观点与先生的一篇文章有所抵牾,这位学生曾为此忐忑不安,而先生读后认为所论颇有可取之处,便大加鼓励。先生指导学生写文章,每当学生有与自己的研究相近的选题,便把积累数十年的资料和盘托出供其利用,毫无保留。先生为师,有教无类,他有许多其他专业和校外的学生,每有前来问道者,总是知无不言,绝不以“门第”、“派系”画地为牢。

先生治学勤奋求实,态度严谨,值得青年人好好学习。先生选择课题,主张多做具体研究,少发空论。他把写文章比喻为磨制珍珠,积累多了,就容易贯穿为一条美丽的项链。而那些以大题目“外包装”来眩人耳目的所谓“成果”,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对空导弹”。先生对学术研究精诚执著的态度令人感动,他热爱事业胜于一切。即使在“文革”期间,先生白天应付政治学习,晚上则悄悄阅读书籍,积累资料,从不间断。先生不轻易发表文章,在整理先生遗稿时,我们发现50年代末未完成的文稿,始终未寄出发表。先生的文章无不数易其稿,九朽一罢。对于已发表的文章,先生也不视为结束案。他把每年发表的作品装订成册,事后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或是发现新的资料,都在相应之处记录下来,学术界同仁对先生文章的评论、通信也都转抄在册或附以原件。上述补充的内容,往往篇幅大大超过原文。举事业惟生命,以学术研究终其一生。先生以古稀之年,承担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齐乘》一书的校注。当他感到身体状况下降时,便加倍工作,但每一问题,仍穷枝叶,绝不草率处理。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这一课题。他欣慰地说:“《齐乘》没留什么尾巴,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先生在病重期间,自己已不能行走,仍每天请师母用改制的轮椅推到案前工作数小时,直至病危住院,仍嘱托我们为他的一篇文章复印两幅插图。先生去世前一天突然胸闷,便要来纸笔,想把未及写出的文章题目记下转交给学生,他写下:“龙与凤”三字即手颤无法握笔。在弥留之际,先生想到的是,仍是永远做不完的研究工作。

(下转 17)

回忆父亲刘敦愿先生

刘善沂 刘 铭 刘 虎 刘 陶

父亲离我们去了。谁也想不到他会走得这样早,虽说 79 岁已不算短寿,但谁都觉得他还可以再活 10 年的。父亲去世前虽然身体虚弱,却无大碍。他始终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写作欲望强烈,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他长期嗜烟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稍有感冒就容易引起肺部感染,但假如能戒烟,保养得法,延年益寿绝无问题;又因住院时摔断股骨,院方未作应有的检查和治疗,以致延误病情,使他大半年卧床不起,导致心力衰竭,终于不治。

父亲是带着遗憾走的。他的论文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在台湾出版,标志着他一生事业的一个新高度,却并非顶点。“文化大革命”夺去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多的时间,现在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他心情舒畅,不止一次向我们流露过他未来的计划。他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来得及做完。病故前,他经常拿起自己的著作抚摸着,似预感到时候不多了。他曾多次向来访的亲友叹道:“让我现在就走实在太可惜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在住院时还念念不忘他的研究,让善沂把他做论文所需要的书籍和资料给他带去。客人来访,他一谈起研究和工作就忘了自己的病情,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以至医生和护士不得不出面干涉。在家中,他不顾医生叮嘱一天工作不能超过两小时的严格禁令,坚持四小时工作。他去世后,善沂和父亲的学生们整理他的遗作时发现还有十余篇未完成的论文草稿,在封套上标着:未完,待补充,重新研究。

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一家满门读书人,祖父在铁路上念书,因成绩优异被派往当时法属殖民地越南学医,后因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而被驱逐回国。祖父虽然终身只是一个铁路职员,却精通法文,兼能英、俄、日语,晚年则埋头于辞典的编纂工作。父亲最初学的是美术,后师从丁山先生学历史,后来走上了考古研究的道路。如果说他无法以科班出身炫耀,那么这正好使他独辟蹊径,最终走出一条新路。

父亲的一生是清贫的。由于山东大学数次迁址,从青岛到济南,从济南到曲阜,再从曲阜到济南,我们家也因而搬迁不下十几次,安定的时候少,动荡的时候多。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全家六口人生活就靠他那一点微薄的薪水,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我们成人之前日子从来没有宽裕过。后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户户要生产自救,父亲每天下课后还要下地劳动,而我们则经常出去挖野菜、拾柴禾、捡煤核。父亲吸的是一毛四分钱一盒的劣质烟,母亲每次只买两毛钱的肉,鸡蛋更是稀罕之物。当时家中最值钱的就是父亲手上那块苏制手表和书架上的二十四史了。就是这样,父亲还常拿出钱来接济一些贫困的学生。长期过度劳累和严重的营养不良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差点儿夺去他的生命。1960 年夏季的一天,家中只有他一人,刘虎从外边回来,见父亲躺在床上疼得直打滚,把他吓坏了,急忙跑去叫系里的叔叔们,到医院后发现是胃穿孔,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就没救了,结果切除了半个胃,命是保住了,却元气大伤,此后十二指肠溃疡一直伴随了他终生。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尽管还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的“殊荣”,但隶属“臭

老九”的行列,自然免不了也受到一定“照顾”。他不参加任何派别,只凭自己的政治觉悟勉力跟党走,用自己学到的美术技能兢兢业业地为“革命路线”服务。然而我们家还未能逃脱悲苦的命运。父亲必须接受一些监督性的“劳动改造”,我们在学校里被当成“黑五类子女”,除刘铭“文革”前一年支边去了青海外,我们兄弟三人先后下乡插队,母亲又以所谓“国民党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关押,受尽百般折磨。压抑的心情摧残了她的健康,于1977年含冤去世了,年仅55岁,至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母亲是维系这个家的支柱,支柱一倒塌,这个家庭就几近崩溃。父亲与母亲青梅竹马,多年相依为命,母亲去世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对他都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过着孤苦零丁、杂乱无序的生活。善沂当时在聊城工作,每次出差回济,料理父亲的生活一段时期,只有刘虎一人每天在工厂下班后骑一个小时的车回家照料父亲,但我们几个子女都不是善于生活的人,更不用说男孩子了。刘陶回城后跟他住在一起,当时不过是一个半大孩子,正念自费大学,连自己还照顾不过来,甭说老父亲了。不久,刘铭夫妇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青海建设兵团返济,由于长期找不到接收单位,一大家人闹哄哄地挤在父亲那小小的三室蜗居里,没有户口,一住五年。父亲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揪心的环境下搞他的研究的。直至1984年继母进门,这种凄凉的日子才告结束,开始了他晚年生活与事业的新阶段。

如果不仅以子女的眼光,而且也以成人的眼光来看父亲,那么我们不想回避父亲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弱点。父亲作为一个学者无疑是合格的,但他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和文体娱乐,虽说这与家庭负担沉重有关,但他的性格也确实如此。他就像一台做学问的机器,将自己整个锁闭在一个象牙之塔中,而塔外的世界是一片空白。

有母亲在,家中什么事也不用他动手。母亲去世后,他的生活就有些杂乱无章了。对于子女的成长,他考虑得也很少。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大多是带着谁到郊区调查考古遗址——这就是我们的郊游了。他偶尔也下下跳棋和象棋,可是教会我们没有几天他就不是对手了,从此再也不介入。他自己不爱玩,也不愿意让我们玩,总是说:“要多做点事,不要老玩。”他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我们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读书。

父亲的社会人生经验似乎也有些贫乏,他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他常常突然带朋友回家吃饭,搞得妈妈措手不及。而他去拜访朋友,即便是不熟的朋友,主人一留他吃饭,他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从不想人家是不是客气,有时弄得主人很为难。

刘铭十五六岁时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一去青海格尔木建设兵团就是十几年。“文革”后政策允许回城了,兵团里有门路的个个远走高飞,连些父亲只是普通工人的战士也有许多回来的,刘铭在青海眼巴巴地盼望着父亲为她办调动,自以为这对一个大学教授易如反掌,谁知几年来直到孩子得了“高原性喉鸣”症也毫无头绪,她与丈夫只好先回济南,一方面为孩子治病,一方面催促父亲为她跑调动。那时母亲已经去世,刘铭一家四口又没有户口,生活十分艰难。望着自己唯一一个女儿那双渴望的眼睛,父亲一筹莫展。一催他,他就唉声叹气;让他送礼找关系,他连连说:“我不会这一套!”他唯一的本事就是给校党委写信,态度谦卑恭顺,情辞恳切凄凉。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是山大一个单位所能解决得了的。有一次,刘铭一气之下说:“×××给学校拿架子,不给解决就辞职不干了。你不会也这样吗?”他又是连连摇头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后来还是山东省委与青

海省委达成了一揽子解决的协议,刘铭一家才得以调到青岛。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除了善沂跟随父亲搞考古受教多些外,像爱情、友谊、工作、事业、理想等等折磨着青春期少年的此类问题,从他那里听不到什么高见,顶多是不拿公家的东西、好好学习之类,也不是父亲冷漠,其实他大半也是心中茫然。

父亲的人缘好,脾气好,开朗健谈,热情好客而且不乏风趣幽默。他抱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不管对谁,校长也罢,工人师傅也罢,他都一律十分恭敬。他每次下去考古发掘,都和农村房东相处得亲如一家,回来后还长时间保持联系。然而细究起来,父亲的“软弱”在根本上是出于“与人为善”的真诚,而绝非圆滑世故。他正直、善良、宽厚,他的内心仿佛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对一切人都敞开大门。他不会为自己打算,所以不精明;他开朗、幽默,是源于良心的安宁。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从不会拒绝别人,几乎有求必应。父亲的学生到家里来吃饭是常有的事,有的学生开学报到或发掘回来,一下火车不回宿舍而是直奔家门,母亲一看,二话不说就下厨房。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参加工作,家里人口多,家境也不宽裕,算起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不用说母亲的劳累了。但我们善良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毫无怨言,他们总是对学生笑脸相迎,而且不许我们对人家说三道四。学生毕业后,为学生找工作又成了父亲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社会各界人士请父亲帮忙,他更是毫不推辞,都是白尽义务。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许多学生、朋友或同事,甚至还有亲戚,蒙受了不白之冤,父亲对他们不但没有歧视疏远,而且能帮则帮,不能帮则尽其同情安慰之责。“文革”后落实政策时,父亲利用自己在学术界所有的一点地位、声望和社会关系积极奔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职称、教学等各种问题,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時候,但确实不遗余力。

他算不上一位好丈夫,因为他爱事业胜过爱家庭;他也不算上一位好父亲,因为他爱学生胜过爱子女。但我们都深深地爱着父亲。

二

尽管我们爱父亲,我们也不能说父亲具有那些伟大学者的“高风亮节”,堪作后人楷模。他只埋头做自己分内的事,平凡而又平凡。作为一个民盟成员,他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父亲是那种深埋于故纸堆的传统型学者。他以文化学术为生命,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热爱的考古事业中,放弃一切物质感官享受,“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的一条人生格言是:“社会上的朋友要少交,学术上的朋友要多交。”父亲曾请山东大学中文系蒋维崧先生将杜甫的《丹青引》写成条幅挂在家中墙壁上,他最喜欢的是其中两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这是父亲的追求,也是父亲的写照。我们认为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恐怕只是局外人的片面看法吧——“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平心而论,父亲的天分不算高,然而他的勤奋与刻苦足以弥补这一点而有余。在他身后即将结集出版的《刘敦愿文集》,每篇论文凝聚着他多少心血是难以想象的。他作为一位美术专科生要在历史考古领域有所作为,唯有比别人多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行。当年他师从丁先生学历史,学习条件十分艰苦,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上课的地方就是嘉陵江的船上。田野考古发掘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累活,当然不比坐在家裡搞研究舒服,因此现在许多青年学子或不屑去干,或视为畏途。而父亲为了弥补专业上的先天不足,不辞劳苦,一头扎进田野考古调查。我们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家裡堆满了破碎的陶器瓦片,就像一个废品收购站。全家人都被他动员起来刷洗陶片,进行拼对修复,大量

的考古实践为父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占有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幼年时,子女多,家中杂乱,父亲白天下课后,只能晚上等全家都睡下后才开始研究,直到深夜,这样养成了熬夜的工作习惯。即使“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没有中断研究,那时他白天参加“革命大批判”或劳动,晚上夜深人静时就偷偷工作。在家中,床头桌边到处是他的书,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应酬外,整天唯有埋头读书写作,连在母亲去世前患病的那些日子里也是如此。当他听说母亲被查出癌症时,就像遭电击一样呆了,即使这样也没有让他辍笔。他一边服侍母亲,一边偷空工作,而一摊开书本,他就什么都忘了,常常连母亲叫他都听不见。就这样,在母亲从确诊到去世的几个月中,他描出了好几大本的插图,后来都在他的《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一书中用上了。父亲的著述水平如何,我们不敢妄评,但敢说 he 勤于写作研究,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他虽然写得快,却绝不粗制滥造。他每有著述,总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比如济南市文化局 1986 年在平阴县东阿镇孟庄清理了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此墓出土的画像内容丰富奇特,是以往从未见诸报道的,父亲为此整整研究了八年时间,才写出《汉画像石上的饮食男女》一文。父亲自称“杂家”,这既是他的自谦,其实也是他视野开阔的优势。他著述广泛,涉猎史学、神话、地理、美术、民俗、农史、生物及古代科技等各个领域,这从他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愈到晚年,父亲的创造力愈加旺盛,研究势如破竹。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开辟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美术考古,获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学术著述之外,父亲还惨淡经营着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这方小小的天地。1972 年,山大考古专业创立了,它像一棵稚嫩的小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有父亲给它辛勤浇灌的心血。他在五六十年代发掘和收集的大量文物成为山东大学博物馆的基础。在草创阶段,父亲作为考古教研室主任呕心沥血,积极奔走,除了亲上北大请人代课外,还多方面搜罗人材,光向校人事处打的报告就不下几万字。今天,虽然父亲去世了,但山大考古专业已初具规模,由一个小小的教研室发展成一个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系,他的学生们已经撑起了他当初惨淡经营的这片天地,现在它已经展现出一片光明美好的未来。

父亲没有千里马的天才,他诚然是平凡而又平凡的,然而他的平凡是老黄牛的平凡——他总是默默地不知疲倦地耕耘着,不计报酬,不问收获。他做的虽然只是自己份内的事,但绝没有丝毫偷懒。其实创造人类历史文化的并不都是伟大的天才,更多的是那些为天才铺路、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权获得与天才同等的尊敬。

三

父亲是幸运的,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位善良无私的女性帮他撑起了事业的大厦,这就是母亲张敏君和继母邓述俊。没有她们也就没有父亲的成功,但父亲的成功却有她们的一半。

母亲张敏君与父亲是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兄妹。母亲为帮助理家只念到初小就辍学了,解放前为谋生曾在柳州国民党政治部做过一段时间的会计,这就是日后把她定为“国民党特务”的由来。解放后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但干过几次临时工,这在山大那些老知识分子家属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渴望出来参加工作,无法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虽然只是个家庭妇女,文化不高,但心地非常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在山大家属院里很有人缘,而且思想非常单纯,要求进步,在山大图书馆作临时工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遗憾的是,她的这种善良愿望没有受到重视。柳州的一段经历困扰了她的整个后半生。她对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一次又一次向组织交待,就那点芝麻粒大的事不知写了多少材料。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审查与专政的对象,遭到关押、拷打、折磨。

对于父亲,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对于我们,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她与父亲感情深笃,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和父亲从未红过脸吵过嘴。她承担起全部的家务,里外操劳,使父亲没有后顾之忧。家境虽窘,但她绞尽脑汁地为父亲增加营养,同时千方百计让我们吃饱吃好,而自己则吃最差的。记得每次吃鱼她总让我们先吃,而自己吃剩下的鱼头,还说“我爱吃鱼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要生产自救,我们课余也要跟随父母下地劳动,但年纪小不懂得为母亲分忧,常常干一会活就想找借口溜出去玩,母亲从没有斥责我们,总是宽厚地放行;她则常常是忙完家务后,又一直干到深夜。母亲整天又洗又涮,双手被碱水泡得又红又肿,手背上全是龟裂的口子,就像久旱的土地。她这样操劳大半生,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可是她很知足,看着我们一天天大起来,都参加了工作,高兴地说:“我真幸福!”然而,就在我们大都参加工作不几年,她却被查出胰腺癌,动手术打开看时,已到晚期。全家唯瞒着她一人,只告诉她这是息肉,她躺在医院病床上微笑着说:“我还不死,我还要为你们多服务几年。”

她爱父亲,爱我们,而真正的爱是无私的。这种爱给了她巨大的力量,使她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却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表现得那样坚毅。也许,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都是这样的吧。

母亲去世后,父亲肝肠寸断。我们只得克制着自己的悲痛,尽力安慰父亲。同时我们也为父亲的生活犯愁。无论如何我们也替代不了母亲在父亲生活中的位置。因此,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父亲再婚,这也是为了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经过朋友的介绍,父亲认识了我们后来的继母,几年交往后,父亲与继母邓述俊于1984年结婚了。

继母一生历经坎坷。她出身于一个封建旧家庭,有一个不幸的青少年时代,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毅然踏上求学的道路,在没有家庭经济来源的艰苦条件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解放后她在济南某中学任语文教师,后长期任班主任,深受学生爱戴。但“文革”中她与丈夫也没有逃脱厄运,受到了残酷迫害,死里逃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个苦命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继母一生的坎坷遭遇锻炼出她倔强的个性,养成了她刻苦俭朴的生活习惯。她做事极其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如此。与父亲结婚前她已退休,但仍作为农工民主党党员积极参加该党的社会公益性质的办学。因为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有口皆碑,因此即使与父亲结婚后,仍不断有人请她“出山”帮助办学。

继母自进父亲家门后没有用过父亲的一分钱,她身上总带着两个钱包,一个装她自己的钱,一个装父亲的钱,根据用途分别使用。她这种做法虽然在我们看来完全多余,但她的这种自尊自强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父亲虽说在学术上达到了教授水平,工资却没有达到相应水平。继母的退休金也不过数百元左右,到九十年代中期,两人收入加起来连两千元都不到。这点钱也就是维持温饱而已。而父亲由于身体虚弱,对饮食的要求又很苛刻。可想而知,料理这个家让谁也会感到为难。继母却坦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她非常善于理家,她做家务也像做工作那样一丝不苟,尽管她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却精于烹调。她不但使父亲生活得十分舒服,而且使家里永远不缺钱花。在她的调理下,父亲那枯瘦菜色的脸转为红润,说话做事精气神十足。原来家里寒酸得如同贫民窟,只有一台14吋黑白电视,连沙发也没有,如今鸟枪换炮,增添了彩电、沙发等几大件。刘陶1989年结婚时,家里还能拿出了一笔钱来资助他。在

继母的精心操持下,家中整个变了样,只见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地板家具光可鉴人。继母对我们几个子女也很关心。刘陶结婚前一直在家里住,继母为他的婚事操了不少心。外人一谈到继母,没有不啧啧称赞的。

继母为这个家到底付出了多少是无法计算的。她对父亲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她修复了一个破碎的家。如果没有继母,真无法想象父亲会过一个什么样的晚年,是否会有现在的成就。我们深深怀念我们的母亲,我们更由衷感激我们的继母。

如果说父亲拙于言教,那么他以身教给了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从父亲身上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人。我们也许没有出众的才华,但是我们起码都是诚实正直的人。我们的家庭是和谐的,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相亲相爱的深厚感情为我们树立了家庭与婚姻的榜样。

父亲以勤奋的工作向我们宣示了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就在于奋斗与创造。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却是有价值的一生。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财富。

原载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上接第 11 页)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和人民,他曾说:“我与那些对民族失去信心的人话不投机。”先生为人表里如一,淡于名利,坦坦荡荡。他十分喜爱王献唐先生所改的两个成语:“守正不阿,疾俗如仇”。虽乏精进,却不消极。先生待人宽厚,温良恭谦,乐于助人。他的品质与他的学问一样,同样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先生晚年留下遗言,身后将家藏图书捐献于山东大学考古系资料室,骨灰撒入黄河。

先生的生命,将永远继续在我们的事业中。

(原载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

考古学家刘敦愿的遗产

——写在《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再版之际

许宏

今年，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恩师刘敦愿教授逝世十周年。1994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自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这部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刘敦愿先生毕生学术生涯及其成果的一个浓缩。由于该书刊行于台湾，颇不易为大陆的读者读到。此次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简体字本，全书的论述涉及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代艺术、神话、民俗、科技等领域，视野宏阔、解读精辟、文笔清新，更兼有图文并茂之美，读者可以从中一睹这位考古学家博学的风采。

由于作者重视考古资料，且具有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和美术功底，课题选择上多从精微处入手，旁征博引，多重论证，故其结论往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有些囿于资料的限制，结论或有需充实完善之处，然其研究方法思路却往往能给人以启发。作者曾坦言他“一向认为，如果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不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自序》）这样一种淡定地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态度，恰恰是今天的治学者需要具有的。

先生生前自称为“杂家”，在清楚划分学科界限的上个世纪后半叶，这一自称在自谦之外，或许还有些许身处“非主流”的自嘲的意味。而今，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最大限度地获取考古遗存所蕴含的丰富的信息，已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和学界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一句“只懂考古已经难以搞好考古”也并非危言耸听。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我很惭愧于自己知识面的狭窄，对先生精通的美术考古、文献史学、神话学等，就不敢置喙。先生曾慨叹“‘学而后知不足’，学而后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蕴积之深厚成就的卓越，自己所能探索的领域既很窄狭，即使有所收获，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自序》）张光直先生指出人为的学科分野划界，颇不利学术的发展，因而强调“通业”，强调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素养才能真正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都是语重心长。这是吾辈后学应当用以自勉自惕的。由是联想起张光直先生1980年代曾愉快地接受刘敦愿先生的邀请到山东大学讲课，应有“通业”学者间的惺惺相惜。就多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而言，两位先生的研究都具有典范的意义。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杂家”。

如果对学者强为分类，刘敦愿先生可能会因其研究的侧重而被划为美术史或美术考古学家。但这样一位美术考古学家，作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科创始人和带头人，却造就出了一支以田野考古见长的队伍，奠定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发展的基础。他不仅不要求我们这些弟子按他自己的路数治学，还鼓励支持我们由田野考古入手，扎扎实实地开展教学和综合研究。这是一个考古学家、学科带头人的战略考虑，堪称远见卓识。这些后学在考古学上的努力，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延长了刘先生的学术生命，这也应当看作是他学术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众多论著中，《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和《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

市布局》是将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所做整合研究的力作。在初次发表于1960年代的前文中，刘先生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东夷诸族鸟崇拜的材料，指出典型龙山文化陶鬲的造型和“鬼脸式”鼎足均应是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特征的反映。这些分析透辟的研究为学界所推重，其观点也较为普遍地被接受。对文献典籍中关于齐国故城城市布局材料的系统梳理和结合当时的考古勘探发掘材料所做复原研究，是今后该遗址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指导价值，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上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先生治学，不以拥有最新考古材料取胜，其所用文献记载与出土资料，都为大家所习见。但先生藉此所做考古学与文献材料的整合研究，却往往独辟蹊径，精微处见功力，发前人之所未发，嚼人家剩下的馍却能再嚼出别样滋味，令人叹服。在考古学界日益意识到地下考古资源的有限性，呼吁田野工作须“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中蕴含的丰富信息的“再发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当被大力地提倡与弘扬。可以预计，其在今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的比重也将不断地加大。

先生国学功底深厚，文章隽永而精悍，更兼文笔优美流畅，深入浅出，所以颇受当时《文物天地》等普及性杂志的编者与读者的喜爱。先生坦言“古史与考古方面的论文，反复论证，现代语言与已经‘死去’了的文字交相杂错，还须辅以大量形象性的资料才能说得明白，因此内容也相当繁琐与枯燥”（《自序》），但读先生对古代名物的解读与考释，每每有酣畅淋漓之感。先生的这类文章，对扩大文物考古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普及古代文化知识，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考古学进入新的世纪，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考古学家更多地思考自身的价值，探讨如何将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和公众。前辈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鉴于上述，这部文集中收录的成文于数十年前的论作，读来并无过时之感，尤其可以让人从学术史的角度悟出许多。相信刘敦愿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中蕴含的精神财富将长久地惠及后学。

（刘敦愿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48元）

刘敦愿先生论著目录

- 《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刘敦愿、逢振镐主编，三秦出版社1988年。
- 《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刘敦愿、逢振镐主编，三秦出版社1990年。
-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刘敦愿，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 《读〈日照两城镇等七个遗址初步勘查〉后的一些补充意见》，刘敦愿，《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6 期。
- 《从黄县古遗址调查论暑假中学生进行考古活动的作用》，刘敦愿，《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
- 《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刘敦愿，《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
- 《龙山文化若干问题质疑》，刘敦愿，《文史哲》1958 年第 1 期。
- 《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刘敦愿，《考古学报》1958 年第 1 期。
- 《滕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刘敦愿，《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 期。
- 《记青岛郊区的三处先秦时代遗址》，刘敦愿，《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2 期。
- 《山东五莲、即墨县两处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刘敦愿，《考古通讯》1958 年第 4 期。
- 《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和艺术》，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 年第 3 期。
- 《论考古学痕迹资料的重要作用》，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61 年第 3 期。
- 《山东临沂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刘敦愿，《考古》1961 年第 11 期。
- 《“考工记·梓人为筍虞”条所见雕刻装饰理论》，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62 年第 2 期。
- 《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畜牧业的作用》，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62 年第 4 期。
- 《根据一张古画寻找到的龙山文化遗址——山东胶县北三里河遗址调查小记》，刘敦愿，《文史哲》1963 年第 2 期。
- 《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
- 《祭灶（火）与藏种巫术——读《西安半坡》札记》，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
- 《济南东郊出土的龙山陶器》，刘敦愿，《考古》1965 年第 7 期。
- 《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刘敦愿，《文物》1972 年第 6 期。
- 《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刘敦愿，《考古》1972 年第 4 期。
- 《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刘敦愿，《文史哲》1978 年第 4 期。
- 《中国古代有关泉类的好恶观及其演变》，刘敦愿，《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 年第 2 期。
- 《山东宁阳堡头大汶口文化墓地和有虞氏关系问题的探索》，刘敦愿，《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79 年。
- 《从夔典乐到夔魍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片断》，刘敦愿，《文史哲》1980 年第 6 期。
- 《中国古代对于动物天敌关系的认识和利用》，刘敦愿，《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 1980 年。

- 《形式逻辑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蔡凤书，《山东大学文科集刊》1980年第2期。
- 《读贝冢茂树〈中国古代之再发现〉》，蔡凤书，《中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
- 《我国养猪史话》，刘敦愿，《农业考古（创刊号）》年第1期。
- 《漫谈工艺美术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刘敦愿，《山东工艺美术（创刊号）》1981年第1期。
- 《给动物系牌挂环的故事》，刘敦愿，《大自然（创刊号）》1981年第1期。
- 《古代关于“狼孩”的传说》，刘敦愿，《大自然》1981年第1期。
-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刘敦愿，《文史哲》1981年第3期。
- 《中国古代的啄木鸟》，刘敦愿，《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 《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刘敦愿，《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第1期。
- 《舜和弟象的关系以及“舜迹”的南移》，刘敦愿，《文史哲》1982年第2期。
- 《古代艺术品所见“食物链”的描写》，刘敦愿，《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漫谈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刘敦愿，《中国农史》1982年第2期。
- 《中国早期的雕刻艺术及其特点》，刘敦愿，《美苑》1982年第3期。
- 《〈吕氏春秋〉“周鼎著饗饗”说质疑——青铜器兽面纹样含义之探索》，刘敦愿，《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 《齐国故城所体现的国家职能及早期城市特点》，刘敦愿，《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
- 《试论战国艺术品中的鸟蛇相斗题材》，刘敦愿，《湖南考古辑刊（创刊号）》1982年。
- 《试论文与文字》，刘敦愿，《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1982年。
- 《漫谈中国古代的黄鼬及其他》，刘敦愿，《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 《商周文字、纹样与绘画的关系》，刘敦愿，《美术史论》1983年第2期。
- 《山西石楼出土龙纹铜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刘敦愿，《文史哲》1983年第5期。
-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未详故事考释》，刘敦愿，《东岳论丛》1984年第2期。
- 《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出土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刘敦愿，《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
- 《谈谈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牛的纹样问题》，刘敦愿，《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 《释齐》，刘敦愿，《文史哲》1984年第5期。
- 《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的细节表现》，刘敦愿，《美术》1984年第9期。
- 《吴越史二三事》刘敦愿，淮阴师专《活页文史丛刊》第9辑，1984年。
- 《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刘敦愿，《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 《“考工记·梓人为筍虞”篇今译及所见雕塑装饰艺术理论》，刘敦愿，《美术研究》1985年第2期。
- 《青铜器装饰艺术中的“火以圜”——圆涡纹含义的探索》，刘敦愿，《浙江工艺美术》1985年第1、2期合刊。
- 《古代关于水獭的认识和利用》，刘敦愿，《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 《试论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刘敦愿，《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梟类题材研究》，刘敦愿，《新美术》1985年第4期。
- 《博学的古文字古史学家丁山教授》，刘敦愿，《文史哲》1985年第6期。
- 《江绍原先生遗作读后》，刘敦愿，淮阴师专《活页文史丛刊》1985年。

- 《中国古俗所见关于虎的崇拜》，刘敦愿，《民俗研究》1986年第1期。
- 《回忆与联想——我与摄影·摄影与考古》，刘敦愿，《摄影学报（创刊号）》1986年第1期。
- 《古俗说鹿》，刘敦愿，《民俗研究》1986年第2期。
- 《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解——兼论宝鸡茹家庄出土青铜车饰族属问题》，刘敦愿，《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
-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刘敦愿，《文史哲》1986年第6期。
- 《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图像及有关问题》，刘敦愿，《湖南文物（创刊号）》1986年。
- 《中国古代的养猪业——兼论农牧结合问题》，刘敦愿，《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 《中国历史时期犀象的分布及其变迁》，刘敦愿，《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 《我国舍饲养猪的起源问题》，刘敦愿，《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 《读〈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札记》，刘敦愿，《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
- 《中国古代的鹿类资源及其利用》，刘敦愿，《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一书读后，刘敦愿，《成都文物》1987年第4期。
- 《恩格斯陶器起源说新证》，刘敦愿，《文史哲》1987年第5期。
- 《中国古俗中的虎崇拜》，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1期。
- 《有关日照两城镇两坑玉器的资料》，刘敦愿，《考古》1988年第2期。
- 《中国古代动物的环志》，刘敦愿，《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 《中国古代文身遗俗考》，刘敦愿，《民俗研究》1988年第1、2期。
- 《青铜器舟战图像小释》，刘敦愿，《文物天地》1988年第2期。
- 《中国古代艺术品所见昆虫崇拜——论商周时期“蝉纹”含义》，刘敦愿，《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 《田横岛所在问题小议》，刘敦愿，《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
- 《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刘敦愿，《美术史论》1988年第4期。
- 《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互相转化》，刘敦愿，《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
- 《干将莫邪铸剑神话试析——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而作》，刘敦愿，《人类学论文选集》第3辑，1988年。
- 《怀念吴金鼎先生》，刘敦愿，《文物天地》1989年第1期。
- 《中国古代对于蛙类的食用和观察》，刘敦愿，《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 《神圣的肠道》，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
- 《扁鹊名号问题浅议》，刘敦愿，《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 《有关西伯利亚猛犸最早的记载》，刘敦愿，《文物天地》1989年第4期。
- 《齐乘》作者于钦墓志简释，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 《鸟兽纹觥装饰艺术分析》，刘敦愿，《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
- 《齐地妇女婚恋古俗谈》，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5期。
- 《试论中国风筝之始见与始作问题》，刘敦愿，《民俗研究》1990年第1期。

- 《战国铜鑑上的庭园植树与观赏养鹤》，刘敦愿，《文物天地》1990年第3期。
- 《中国青铜器上的采桑图像》，刘敦愿，《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
- 《中国古代民间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5期。
- 《赵昕〈息“灯鹞”文〉简释》，刘敦愿，《文史哲》1990年第6期。
- 《试论古代黄淮下游与江汉地区之间的交通关系》，刘敦愿，《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1990年。
- 《从痕迹中重现出来的遗物》，刘敦愿，《文物天地》1991年第1期。
- 《“聪明”的蜻蜓与神异的蜈蚣——中国民间传说与日本的考古发现》，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1期。
- 《论湘潭商代豕尊》，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1年2月。
- 《甘肃黑山岩画狩猎图像中的飞鸟》，刘敦愿，《文物天地》1991年第2期。
- 《“鸟衣”得名考》，刘敦愿，《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中国古代的食用昆虫及有关问题》，刘敦愿，《古今农业》1991年第2期。
- 《〈齐乘·风土〉章校注》，刘敦愿，《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 《中国古代有关农业的“孕育仪式”及其他》，刘敦愿，《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4期。
- 《也谈“鸛鱼石斧图”的含义》，刘敦愿，《文物天地》1991年第5期。
- 《岳石文化陶器上的叶脉印痕》，刘敦愿，《文物天地》1992年第1期。
- 《论古代仿匏器皿及其艺术构思》，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2年3月。
- 《徐州汉画像石“击马图”》，刘敦愿，《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
- 《王献唐先生曾经如是说——记邾国故城出土秦瓦量残片事》，刘敦愿，《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
- 《民间工艺美术与青铜器装饰造型构思问题》，刘敦愿，《民俗曲艺》1992年9月。
- 《试论中国古代的鹰崇拜》，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2年10月。
- 《关于战国青铜器画像问题的若干思考》，刘敦愿，《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刘敦愿、蔡凤书、栾丰实等，《考古》1993年第4期。
- 《齐瓦当上的树木纹》，刘敦愿，《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 《青铜器上的狩猎图像》，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6月。
- 《青铜器装饰因素与纹样含义》，刘敦愿，《鉴赏》（创刊号）1993年12月。
- 《中国古代文明之起源与发展》（中译本）序，刘敦愿，1994年1月。
- 《牙璋与安丘商代铜戈》，刘敦愿，《文物天地》1994年第2期。
- 《汉画像石上的蹴鞠图像》，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3月。
- 《天圆地方思想的起源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6月。
- 《论汉画像石艺术中的庖厨题材》，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8月。
-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艺术》，刘敦愿，《济南日报》1994年9月3日。
- 《汉画像石上的“饮食男女”——平阴孟庄汉墓石柱祭祀歌舞图像分析》，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12月。

《神圣的肠道——从台江苗绣到大波那铜棺图像（修订稿）》，刘敦愿，《中国神话学论文选萃》，中国电视出版社 1994 年。

《关于香港“牙璋”问题及其他》，刘敦愿，《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论鸛鱼石斧图的艺术性及其他》，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5 年 12 月。

《宁阳磁窑鸟形陶鬲》，刘敦愿，《文物天地》1996 年第 4 期。

《东夷考古》序，刘敦愿，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抗战时期山东图书文物的内迁》，刘敦愿，《文物天地》1997 年第 1 期。

《彩陶盆舞蹈纹样研究》，刘敦愿，《故宫文物月刊》1997 年 3 月。

《地理因素在山东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刘敦愿，《农业考古》1998 年 1 期。

《贝冢、贝丘和贝壳堤》，刘敦愿，《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中美联合考古队结束在鲁东南地区的考古调查

2007年11月1日至12月4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在鲁东南地区展开了为期34天的系统调查,发现并记录了一批史前至汉代时期的遗址。

此次调查分为南、北两区,调查面积约130平方公里。南区主要包括日照市境内的傅疃河及其支流流域,涉及巨峰、后村、南湖3个乡镇;北区主要包括胶南市的吉利河及其支流以及白马河流域,涉及胶南市的海青、大场、理务关、大村4个乡镇以及诸城市东南一隅。南区所在地理区域位于傅疃河上游,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新发现遗址数量不多。后马庄是一处记录在案的龙山文化遗址,此次对其作了系统调查与记录。新发现的重要遗址有大后村(龙山)、李家洼(西周)、卫星营(两周)和西黄山前(汉代)等。北区所调查的地理区域属于吉利河、白马河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新发现遗址数量较多。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胶南市丁家柳沟(龙山文化)、丁石桥(龙山)、双河(龙山、两周、汉代)、驼沟(龙山、两周、汉代)、吉利河村(汉代),诸城市解家庄子(龙山、商代、两周)、南张家庄(龙山、两周、汉代)、小曹家庄(两周、汉代)等。另在现在胶南与诸城市分界线一线,发现了属于界碑的石刻及立石遗迹,年代可能上溯至汉代时期。上述资料的获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该地区史前至汉代时期聚落形态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变迁。迄今为止,这一考古合作项目已历时13年,调查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发现并记录史前至汉代时期的各类遗址2000余处,史前遗址(主要是龙山遗址)近600处。

参加本季度调查的美方成员有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文德安(Anne Underhill)教授、加里·费曼(Gary Feinman)教授和琳达·尼古拉斯(Linda Nicholas)研究员,中方成员有山东大学方辉教授和在校研究生王迪、徐波、乔卓俊和郭明建,青岛市考古研究所尹锋超和日照市博物馆刘红军也参加了调查。(乔卓俊)

我校考古队在河南发现龙山文化城址

西金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北部博爱县东南7.5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穿过遗址东部。在历史文化学院和考古系、考古中心各级领导支持下,我校考古系王青教授率领考古队自2006年夏季开始对该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克服种种实际困难和不利条件,至2007年冬季连续工作两个年度四次发掘,目前野外工作已经完成。共计发掘面积5200余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一座,并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小麦遗存,对研究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和人地关系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该城址位于西金城村中东部,城墙位于地表1.5米以下,残高2—3米。城址的平面形状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唯西南角向内斜收,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北墙长560、西墙520(含斜收部分)、南墙400、东墙440米,周长近2公里。城墙宽在10—25米之间,系用较纯净的褐色生土拍打筑成。西、南墙中部可能有城门,北、东、南墙外侧发现有小河或排水沟环绕形成的防御壕沟(图2)。从城墙及壕沟出土陶片判断,该城址应始建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

进入龙山晚期已经废弃，距今 4300 年前后。

发掘主要在城址以外的东南部，出土龙山文化完整或可复原陶器以及典型标本数百件，主要有陶罐、豆、壶、鬲、罍、觚、盆、双腹盆、刻槽盆、单耳杯和鼎等，整体文化面貌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中晚期。出土龙山时期各类石器 200 余件，主要为刀、镰、铲，另有少量斧、镞、砺石和石芯等，制作较规整，但硬度和质量较差。这些石器绝大多数出自龙山时期的沼泽相堆积中，没有固定的出土遗迹，出土深度也深浅不一，应是在劳作过程中就地丢弃的，这说明发掘区应是龙山人的生产区。

龙山时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文明社会即将诞生的关键时期，城址的出现就是其显著标志。目前，河南省已发现龙山城址十余座，充分显示了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地位。豫北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但目前所知龙山文化城址只发现三座，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不相称，本次发现的西金城城址为第四座，预示着这一地区龙山城址的分布应与豫中地区一样较为密集。尤其西金城龙山城址与温县徐堡龙山城址相距不足 10 公里，这在豫中地区也很少见。因此，西金城龙山时期城址的发现必将有力推动中原地区社会演进和文明起源的研究。

针对发掘区的堆积特点，本次工作还以复原该遗址龙山时期人地关系演变为目标，及时确立了环境考古研究课题，积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从事古地貌、动物、植物、石器、陶器以及遗址资源域等几大方面的研究，这是河南全省五十多个南水北调考古项目中唯一主动设立的学术课题。

我校东方考古中心实验室承担了龙山时期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已发现粟、黍、稻、小麦和大豆等，其中小麦是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对研究小麦种植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有重大学术价值。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袁宝印、北京大学地理系夏正楷先生来遗址实地工作，对北起太行山东麓山区、南抵黄河北岸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古地貌变迁过程，以及龙山时期沼泽堆积的成因作采样分析；邀请中国地质大学邹胜利博士对出土的龙山期田螺壳进行了类脂物分析，以恢复沼泽堆积的水环境；邀请吉林大学考古系汤卓伟先生来遗址工作，对出土的龙山时期石器进行了岩相鉴定，并调查了石料产地。

另外，本课题还同时进行了龙山时期田螺采集季节的分析，初步认为是春夏季采捞的，这使过去一直受到忽视的小型动物遗骸恢复了其研究价值；对龙山文化石器的制作也作了实验考古分析，从出土石器中成功识别出两件管钻所留的圆柱形石芯，使龙山文化石器的研究走向深入；本次还进行了国内首次遗址资源域分析的初步尝试，圈定出一个直径 6—8 公里的椭圆形地域范围，龙山人获取生存资源所进行的日常活动基本就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对全面恢复龙山时期的人地关系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对今后我国开展遗址资源域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义。本课题的孢粉、植硅石、淀粉粒分析和动物遗骸的鉴定分析等正在进行。

总之，此次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充分展示了我校考古专业近年来的教学和科研优势与实力，尤其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始终坚持课题意识、积极从事环境考古前沿研究的科学态度，受到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高度肯定与赞扬，很好地宣传了我校近年考古教学和科研特色，为今后的发展作了较好铺垫。（王青、王良智）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马强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关键词:商代 青铜器 草原游牧文化

一、 出土青铜兵器形制及其时代特征

甘泉县阎家沟商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和北方系铜器特点,其中曲茎铃首剑、铃首匕和三釜刀等兵器是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出土的2匹青铜马,体格健硕,躯体浑圆有力,都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特色。对这批铜器的探讨可进一步加深草原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关系的认识。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共7件,包括钺、戈、剑、刀、镞。现分别介绍如下:

1. 有阑直内羊首钺一件。

通长21.5、刃宽12.8、内长7.2厘米。器身呈长斧形,直内狭长,内上有一方形穿,饰菱形雷文组成的兽面纹,鼻子呈三角形,额上有一U字形纹饰。阑部正中铸一高突直角羊首,眼睛突出,面部狭长。钺身饰云雷纹和简化兽面纹,兽面仅有目、角。这种纹饰组合不见于他器,是第一次出现的新造型。钺刃部为弧形,上侧刃长,下侧刃短,周围有一圈宽1.5厘米的凸起带,钺两面的造型、纹饰完全相同(图一)。

该钺的形制较为特殊,饰有线条简洁、纹饰突兀的简化的兽面纹,原报告认为“阑上的直角羊首形象也与其它地区的羊首不同而与陕西延川马河出土的羊首匕柄端的羊首相似”¹,但经笔者观察马河出土的羊首匕作长板式,柄部略窄,柄端铸一对向后弯曲的羊角,象征羊首²(图二)。与该钺阑上的直角羊首形象不同。此钺的形制按照朱凤瀚先生《古代中国青铜器》青铜兵器一节可将此钺划归为小型钺的Ab型³,但未有与此器形制近同者。依刘静在其《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⁴一文,可将此型钺归为斧型钺中的长斧型钺但不能具体到某一式,因其论文所列出的青铜钺并未有与此器形制近同者,当为本地方特色。青铜钺上饰羊首说明钺不单纯是武器和刑具,也可能有杀“牺牲”祭于社的礼器性质。随葬青铜钺也说明该墓主人的地位比较高,在考古发现中,随葬有铜钺的墓葬

作者简介:马强(1982—),男,回族,宁夏固原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在读硕士。

¹王永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3期。

²姬乃军:《陕西延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³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26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

⁴刘静:《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总第130期)。

中，随葬品都较丰富，这也是进一步确定使用铜钺者身份较高的有力证明。

2. 戈两件，分为直内戈和釜内戈两型。

直内戈，残长 10.6、内长 7 厘米，援部残，长方形内，近阑处有一圆穿，末段为半弧形，下有一小刺，内边缘有半圈凹槽。有上下阑，上阑短，下阑长（图三，1）。该戈的形制与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出土的戈M63:2⁵、山西石楼后兰家沟⁶（图三，2）、陕西西安老牛坡M10:7⁷（图三，3）出的铜戈相似，均为商代晚期遗物，断戈入葬应是上古之孑遗。

短胡无穿釜内戈（图三，4），通长 23、援长 16、胡长 7.3、内釜径 3.5 厘米。素面，援中部厚，刃部薄，前鋒尖锐，援末下垂成短胡。内呈长方形，末端为半弧形，下有一小刺，前部有椭圆形釜，自釜外铸三道凸棱直达锋端。此种短胡釜内戈极少见，李健民先生《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⁸一文中对北方草原出土青铜戈做了类型学分析，但未见有此种铜戈出现。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出土釜内戈 103 件，但均未有援末下垂呈短胡者，此戈援末下垂成短胡但并未有穿，穿是为了穿绳缚秘的，这是否意味着该戈非实用器。山西灵石旌介商墓⁹出土多件釜内戈，该戈的形制与之近似，所不同的是灵石旌介商墓的釜内戈援末下垂成的胡都设有一穿。釜内戈始见殷商二期，流行于三、四期，后经改进为釜内有胡戈，此戈似是这种渐变的过渡类型。

3. 铃首剑一件。

通长 39、刃长 26 厘米。剑身呈柳叶形，双面刃，中部起脊直通剑锋，刃部锋利。曲茎，茎扁圆，中空，前粗后细，有格。六个铜瓣围成铃首，铃内有核。剑茎饰阳线相隔的小点纹，两侧各有一条镂空，其上各饰三枚铆钉，茎一侧与铃首相接处有一环（图四，1）。这一类型短剑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¹⁰、山西柳林高红¹¹、石楼义碟¹²、保德县林遮峪¹³（图四，2）、陕西延川县¹⁴（图四，3）等地多有出土，是青铜短剑中最早的形制，流行于商代晚期。短剑柄端普遍流行兽头和铃形装饰，在短剑的首部往往带有圆形环扣。进入西周时，这种早期流行的兽头和铃形装饰减少，盛行蘑菇状剑首，首下的环扣也随即消失¹⁵。

4. 三釜刀一件。

残长 26、刃长 3 厘米。残断成三截，釜部残缺，仅存刃部。长条形，刃平狭，近脊处正反面饰乳钉纹。这种近阑处正反两面各饰乳钉纹的三釜刀是商代晚期常见的器形，同时代器在陕西延长县黑家堡乡¹⁶、绥德县¹⁷、石楼后兰家沟等都有出土。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8 月，第 46 页。

⁶ 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 年第 4、5 期（总第一三八、一三九号）。

⁷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 年第 6 期（总三八五期）。

⁸ 李健民：《被封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 年第 2 期。

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海金乐、韩炳华编著：《灵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9、126 页。

¹⁰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 年第 1 期。

¹¹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 年第 3 期。

¹² 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 年第 8 期。

¹³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4 期。

¹⁴ 阎晨飞、吕智荣：《陕西延川县文化馆收藏的几件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4 期。

¹⁵ a.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 年第 1 期。

b. 张锡琰：《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考古》，1984 年第 8 期。也持此说。

¹⁶ 姬乃军：《陕西延长出土一批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2 期。

¹⁷ a.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41 页。

5. 箭镞一件。

通常 5.5、铤长 2.5、翼残宽 2.5 厘米。一后锋残缺，三锋两刃，两翼较宽，两刃略呈弧形，后锋尖锐，长出关后。铤为圆锥形。此形式镞持续时间从二里岗期到战国早期一直存在，北方地区多此类型，在伊金霍洛旗朱开沟F50001¹⁸、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乡张兰沟村¹⁹、绥德²⁰、山西石楼义碟²¹、灵石旌介商墓等多有出土。

另有剑鞘一件，仅残存鞘头部分。饰有阳线相隔的小点纹。

二、 相关问题的讨论

此次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出土青铜礼器 15 件，包括兽面纹鼎 1 件、简化兽面纹鼎 3 件、无耳簋 5 件、鬲 1 件、扁体卣 3 件、简化兽面纹觚 2 件。兵器共 7 件，有羊首钺、戈、曲茎铃首剑、三釜刀、镞等。马、铃首匕、泡饰等其他铜器共 35 件以及素面金箔片、骨镞、骨牙、绿松石等。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地方性特色比较浓厚，本文试就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1. 关于器物组合

甘泉县阎家沟商墓是洛河流域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墓葬，出土器物丰富、年代关系明确，是截至目前陕北地区发现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特别是在商代晚期墓葬中出现四鼎五簋的器物组合²²，这是首次发现。该墓葬出土的器物以鼎、簋为主的食器组合，同时配以尊、罍、觚、卣饮酒器，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地区发现的晚商青铜器组合形式多以鼎、簋、觚、爵、甗、盘、壶为主体²³，是酒器和食器的配合，但不见以偶数鼎和奇数簋的这种组合方式。阎家沟商墓是以多件食器为主的组合，这与中原地区商人重视酒器的墓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重食器现象在该地区礼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是该地区的本土特点。在殷墟发现过一些只陪葬蒸食器而没有饮酒器的墓葬，列表如下：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第 93 页，图版九七。图版说明第 15 页。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¹⁸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

¹⁹ 姬乃军：《陕西延长出土一批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2 期。

²⁰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41 页。

²¹ 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 年第 8 期。

²² 原报告称为“组合”，然是否可以称之为“组合”还需继续讨论，因为这种出现于商代晚期墓葬的四鼎五簋的配置是首次出现的孤证，其中的饕餮纹鼎是殷式的，其余 3 鼎为本地特色。称其为“组合”，还需今后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²³ 李锋：《试论陕西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分期与分区》，《考古与文物》，1986 年 3 期。

墓号	面积米 ²	鼎	簋	鬲	期别	资料出处
76 武官M229 ²⁴	1.9	2			二期	《考古》1977年第1期
西区M764 ²⁵	1.68		1		三期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西区M275 ²⁶	3.69	1	1		四期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西区M1573 ²⁷	1.76	1	1		四期	《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西区M284 ²⁸	3	1			四期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82 苗圃M39 ²⁹	2.42	1			四期	《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白家坟西KBM13 ³⁰	4.03	1			四期	《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西区M1102 ³¹	3.51			1	四期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这些墓葬面积从1.68~4平方米不等，出现在殷墟二期、四期阶段。出土的器物很单一，只有食器鼎、簋两种，而无饮酒器，其中西区M1102以鬲代鼎。当然这样的例子不仅限于殷墟西区，在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也不乏其例。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在陕西出土的西周早期墓葬中也有一些只陪葬蒸食器而没有饮酒器的墓葬，如57长安张家坡178号墓出土鼎1簋1，60长安张家坡101号墓出土鼎1簋1，67长安张家坡54号墓出土鼎1簋1，73岐山贺家村5号墓出土鼎1簋1，73岐山贺家村6号墓出土鬲1簋1。其中73岐山贺家村6号墓以鬲代鼎。

这种以鼎、簋饪食器为主的组合在陕西关中、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也多见，是周初最普遍的组合形式。商墓中的这种重视食器鼎、簋组合也是比较普遍的组合方式。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商人重视酒器，周人重视食器。但是此次阎家沟墓葬的发现和上述列表殷墟墓葬，表明商人的中小贵族和下层人民还是相当重视食器的。

上述商晚和西周早期的这种鼎、簋组合形式是殷商和西周同时并行发展的，还是先后交替的？是殷商在葬俗方面对西周的影响，亦或是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 该墓的文化内涵及渊源

阎家沟商墓原报告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系统³²。李家崖文化，是以在陕西清涧县李家崖村西发掘

²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²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²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²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²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²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³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³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³² 王永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甘泉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的古城而命名的³³。发现了城墙、房子、窖穴、墓葬，出土有陶器、石、骨器、青铜器等。吕智荣先生认为：“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以东的陕北地区，山西省吕梁山、火焰山以西的晋西北地区及阴山以南的内蒙地区，大体为李家崖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³⁴。

陕北商代铜器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无定河和清涧河下游地区，先后在清涧张家圪、解家沟、寺塬村、李家崖村，绥德塬头村、薛家渠、后任家沟，延川刘家渠、去头村、土岗村，延长驮步村、前张罗村以及吴堡、子长等地均有发现³⁵。器类有爵、觚、罍、尊、鼎、簋、桯、壘、甗、盘、壶、勺、斗、匕、刀、剑、戈、戚、镞、斧、铤及铜泡等。是一套明显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器型与一套基本同于商文化器形的共存。在这些铜器中，礼器以及戈、镞等兵器大都为安阳殷墟所常见，是典型的商文化作风。有一些则明显区别于中原商文化，如蛇首匕、马头刀、釜内刀、长釜斧、羊首钺、铃首剑、铃首匕、青铜马等，都是富有地方特点的器物。这类铜器和山西省的石楼、保德、柳林、永合等地一带出土物的风格完全相同，地域相连，隔河相望，构成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当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学术界普遍认为与当时活动在这一带少数民族有关。张长寿先生认为可能是殷商时期某方国的所在地³⁶。邹衡先生认为当是鬼方、土方或棣方文化³⁷。吕智荣先生认为李家崖文化是鬼方先民的遗存³⁸。

此次阎家沟村所出晚商青铜器也应当是上述某一方国的首领墓葬。从出土的羊首青铜钺来看，该墓葬的级别很高。青铜钺最基本的用途应该是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象征贵族等级的刑罚权，有严格的赐用制度³⁹。它具有象征最高的军事权力，钺用于治军。掌控刑罚号令的权力，钺用作礼器。

3. 该墓反映出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

阎家沟商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草原游牧性的文化特征。该墓葬虽因机械施工损毁严重，但现场的积土进行了过筛，但并未有陶片出土，这意味着与该墓共存的陶器极稀少，反映出草原游牧文化的特点。从出土的青铜器类型看，虽有殷式的鼎、尊、甗等礼器，然共存的青铜器，如簋、扁体卣、三釜刀、管釜戈、铃首剑、铃首匕、羊首钺等，无论是种类、造型和纹饰，均与殷商青铜器有别。

所出青铜器纹饰简洁朴素，除饕餮纹鼎外，其余各器素面无纹或饰简单的凸弦纹和仅饰以扉棱与乳钉组成的简化兽面纹，作风一致，在中原地区较少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铃首剑、铃首匕、三釜刀是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铃首剑剑茎、剑鞘上阳线相隔的小点纹和出土残剑鞘上的小方块纹、波折纹，都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典型的纹饰。4件无耳簋，其中2件为素面簋，另2件饰有弦纹，这与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出土的高圈足直线纹簋相似，出土的扁体卣，适用于迁徙、移动便于携带，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内涵。

从而表明该墓主人显然不是商人，而是流动于陕西北部，卜辞、金文所证实的商代方国诸如土方、鬼方等文化遗存的主人。

这也可以证明出土的4件青铜鼎中，1件饕餮纹鼎和另3件简化兽面纹鼎装饰风格迥异的原

³³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³⁴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³⁵ 李自智：《建国以来陕西西周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³⁶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

³⁷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78—280页。

³⁸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³⁹ 刘静：《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总第130期）。

因。饕餮纹鼎形体较大，纹饰精美，颈部饰一圈虎耳兽面纹，是典型的商人铜器，笔者认为该鼎当是从商人掠夺所得，亦或是商人赠送即赠贖制度⁴⁰所得商人之器，这还须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4. 关于青铜马

马在考古发现中，以西安半坡遗址出现的马为最早，但经过科学鉴定认为不属于驯养的家马。马被驯化以后，作为贵重的赠送礼物在商周时期十分盛行，在史书中也有关于以马相赠的记载，至迟在商的早期，君王就开始乘坐马车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可见马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驯服的役畜。

应当指出的是，驯马驾车的成功并不等于骑马文化，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骑马文化，则最早兴起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其逐水草而迁徙，放牧牛、羊、马等，以畜牧为主，射猎禽兽，基本上没有定居的聚落和农业生产，其居所无定而随时转移。

此次阎家沟商墓出土两匹青铜马，属首次发现，是国内已知最早的独立青铜马圆雕艺术品，其体长健硕，四肢粗短，脖颈粗壮，口鼻尖削，鬃毛短直，长尾下垂，背有脊线。关于这两件青铜马的用途，我们认为应是随葬用的明器，古代视死如生，大贵族、方国墓中常有御者及车马实物出土。此墓葬中所出两匹马，背上有椭圆形的背垫，从其所处的位置看，似具有马鞍的性质，是否为马鞍的最初原始形态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来解决。

5. 青铜器出土的重要意义

陕西北部地区曾先后出土过一些重要的商代青铜器，如清涧县张家圪、清涧解家沟、绥德县塬头村。而在同处陕北的延安地区，延长县黑家堡乡前张罗沟村、延川马家河乡用斗村。此次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出土的商代铜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它为研究商文化的分布及影响范围，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阎家沟出土的商代铜器，以鼎、簋食器为基本组合，同时配以鬲、尊、罍、觚、卣、羊首钺、铃首刀、铃首匕等。器物的造型、纹饰多与中原文化有较大差别，说明当时这一代非商王朝势力所及之处。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兵器与陕西清涧、绥德和山西保德、石楼文化内涵比较接近，是具有地方色彩的青铜器，当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可能属于鬼方或土方、棣方等某一方国的古文化。

阎家沟北依三榭山，南临洛河，地处商的西北部边地，处于北方草原文化区和商文化区相接壤地带，因此，势必要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保留和吸收某些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阎家沟商墓出土器物中的地方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草原游牧文化与周围地区商文化的交流情况。

总之，阎家沟商墓的发现我们认为它为研究商文化的分布及影响范围，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该墓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因素为主体吸收了临近的商文化因素，同时又较多地保留了某些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鬼方或土方、棣方等某一方国的文化。

以上所述，仅是我个人对陕西甘泉县阎家沟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的一些初步理解，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本文经吾师张懋谿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舍友刘长新利用宝贵时间翻译校对本文英文摘要，在此深表谢意！

Bronze weapon vessel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⁴⁰ 曹玮：《试论西周时期的赠贖制度》，曹玮著：《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165-175。《东周时期的赠贖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年6期。这两篇文章虽讨论的是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赠贖制度，但对于我们了解商代的赠贖制度亦不无裨益。

Ganquan country , Shaanxi province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

Ma Qi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ome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were unearthed in June 2005 at yanjiagou village of Ganquan country shaanxi province , which was reported on the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2007.Because the cultural relics were found during the mechanization of construction., so there was a badly breakage, and the virginity of the excavating location was thoroughly destroyed .With arrangement, seventy cultural relics were unearthed, fifty-seven bronze vessels included, such as ritual vessels, weapon vessels, mixed vessels and so on. And here this paper would try to do some research to these bronze vessels and related questions.

Key words: shang dynasty bronze vessels The Grassland Culture and the Nomadic Culture

作者简介: 马强 (1982—), 男, 回族, 宁夏固原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在读硕士, 师从张懋镕、曹玮先生。

邮政编码: 710062

联系电话: 029-85313121 13630229421

电子邮件地址: feiwen2@163.com

06 级研究生赵敏参加 2007 吉林大学考古学术论坛

2007年7月16、17两天在吉林大学召开了“2007 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来自国内外的近40位女性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论坛主要分为五个大的议题：

- a、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 b、区域考古研究
- c、体质人类学与古DNA研究
- d、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 e、文化遗产研究、文物研究

女性学者对自己从事的相关领域进行了精彩的汇报，06级研究生赵敏在靳桂云老师的指导下做了“植物考古与古代农业研究”的报告，简要介绍了植物考古的历史以及一些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重点介绍了植物考古近几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通过此次会议，希望更多的学者将了解植物考古，更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使学者们认识到植物考古的重要性。（赵敏）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栾丰实教授等赴日本参加 “山东半岛地区稻作农业及其东传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

2007年7月21-22日，日本九州大学举办了“山东半岛地区稻作农业及其东传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是山东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合作研究东亚地区水稻传播路线项目的第二次研讨会。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靳桂云教授和烟台市博物馆的王富强副馆长参加了研讨会并分别做了大会报告。

该项目开始于2004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报告几年来的工作成果。中日学者从古代农业研究方法和思路、稻田研究、农业生产工具研究和谷物加工工具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稻作农业从山东半岛通过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九州的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该项目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古代农业研究。

来自日本7个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报告结束后，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和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冈村秀典教授发表了点评，不仅对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

研讨会结束后，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陪同栾丰实教授一行参观了九州地区著名的吉野里遗址、装饰古坟博物馆、东名贝丘遗址等。（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靳桂云教授赴波兰参加国际环境考古年会

2007年9月12-15日,国际环境考古年会(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AEA)在波兰的波茨南(Poznan)市举行。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靳桂云教授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国际环境考古学会、波兰Adam Mickiewicz大学、Biskupin博物馆、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国际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Adam Mickiewicz大学承担了会务工作。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Eurasi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报告内容涉及整个欧亚大陆第四纪时期(以全新世为主)环境与人类文化相互关系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共分为9个专题,其中一个专题是“东亚地区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Man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in continental East Asia)”,靳桂云教授和德国考古研究院的王睦教授共同主持了该专题的讨论,并作了“中国东部赵家庄遗址新石器时代水田”的报告。

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古代稻田的研究,因为最新的研究表明,人类对温室气体的贡献可能早在8000年前后就开始了,而古代稻田由于其释放甲烷等特点,倍受环境考古专家的重视。中国具有悠久的稻作农业传统,对新石器时代稻田进行系统研究,将为认识古代人类农业活动对地球气候系统的影响等科学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然而,中国新石器时代稻田的研究,目前主要局限在长江流域的少数考古遗址,黄河流域几乎是空白。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宫崎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的新石器时代稻田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上很多学者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还有些学者提供了欧洲学者关于古代稻田研究的重要信息,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继续工作的重要资源。

室内的学术讨论结束后,会议组织了野外考察,代表们考察了3个考古遗址,并详细了解了结合考古研究进行的环境考古分析工作的情况。(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大环境考古学科获国家“111计划”资助

日前,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负责的“环境考古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2008年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111计划”二期培育项目资助。该基地是继蒋民华院士负责的“功能材料与器件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张运院士负责的“心血管基因组医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后山大第三个被“111计划”立项资助的项目。

山大获资助二期培育项目首批资助经费为90万元,其中国家外国专家局45万,教育部45万,从学校“985工程”建设经费中列支。培育项目参照“111计划”管理,在“111计划”二期启动时,视进展情况经相应程序后纳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中。

“111计划”是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等学校自主创新的重大举措。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为平台,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配备一批国内优秀的科研骨干,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建设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2 年，重视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合作，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分别与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本引智基地计划引进的学术大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 Henry Wright 教授。以他领衔的海外学术团队，人员大多来自已与山大建立起学术联系的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是在社会考古、环境考古等众多学科领域做出杰出成绩的著名学者。参加本项目的中方学者大多来自山大不同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内不同高校，学科领域涉及考古学、年代学、环境科学等。他们将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对我国黄淮海地区环境与社会考古学展开一系列研究。 {作者:郭文杰 来自:国际处 科技处}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匡悌先生来我校访学

2007 年 11 月 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匡悌先生来我校访学，并为考古系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社会永续经营的策略与抉择：一个考古学研究的观点”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王青教授主持，宋艳波老师、考古系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出席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一、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

- A. 重建文化史；
- B. 复原过去的生活方式；
- C. 探索文化过程

掌握与了解考古资料与现代社会关系：“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研究应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正面的影响作用，否则它什么都不是。”相关书籍：Human Impact on Ancient Environments: Landscape, Natural Resources and Science By Kuangti Li

二、基本工作原则：

- ① 人类社会的运作和形式与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 ② 气候变迁造成环境变化是促使人类文化改变的重要因素；
- ③ 两个因素影响的比例是不是 1: 1?

三、增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永续 (sustainable) 发展的关键：

- ① 人类和其社群会因为遇到问题和机会而改变；
- ② 改变发生在一连串空间及时间的变化；
- ③ Arnold Toynbee (1920s) 认为社会的命运和它们如何解决问题有关

四、Attributes Socio-Ecosystem Collapse to Failures of Problem Solving

- ① 当问题来临前没有预先准备；
- ② 当问题来临时却没有发现；
- ③ 甚至不去尝试解决问题
- ④ 尝试解决问题，但失败了。

五、Why should we look to the Past to Solve Tomorrow's Problems?

我们的目的不是了解历史本身，而是整理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用在先进的社会。

什么样的问题必须解决：常态的波动；相对于巨大的气候变化；环境背景的变化，如大的气候波动似的社会改变：

1 利用前一来解决问题：

- ① 往资源丰富的地方
- ② 移动性和社会规范一直了物资和设备的等级
- ③ 再一次的移动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2 经由生态系统管理来解决问题：

- ① 为了平地 and 燃料来砍树
- ② 一直有竞争性的植物
- ③ 重新改变水的流向
- ④ 增进农业技术

3 经由社会复杂性来解决问题：

- ① 创造能力以及储存的概念
- ② 在立即需求下合理的扩展能力
- ③ 私人财产的概念以及地位归属
- ④ 社会秩序法制化

六、是否有唯一而且最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1. 要了解自己很困难

有时我们会被我们要做的事以及我们认为会发生的事所混淆；考古学能提供足够的情况让我们了解特殊的解决方法是几乎不可能的。

2. 不可将因果关系想的太简单：世界是复杂的文化脉络；生业技术；食性；聚落发展与食物资源的摄取；永续经营的策略规划。（李慧冬）

方辉教授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日前，据教育部文件通知，山大 11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 2007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期限为 2008 年至 2010 年。资助金额自然科学类每位为 50 万元，哲学社会科学类每位为 20 万元。实施“985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高等学校入选者的支持经费由所在高校“985 工程”建设经费资助。我中心方辉教授荣列其中。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教学改革，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进行创新研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自 2004 年开始实施，每年评审一次。（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王青教授参加河南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庆典

暨两周列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7年12月6—7日，由河南博物院主办的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庆典暨两周列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北京、陕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山东以及台湾等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李伯谦先生首先做了大会发言，就最近十年来的两周考古研究发表了三点重要意见。他指出，近十年来我国的两周考古取得了很大成就，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1998年以来两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60多项，其中10余项入选十大考古发现，如陕西周公庙、秦公大墓、山西羊舌晋侯墓地、河南鹿邑大墓、郑公大墓、山东前掌大墓地和成都蜀王船棺墓等；与此同时，考古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先周和宗周考古文化序列、宗周时期文化分区、周代礼制、周边考古文化和文化变迁宏观考察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多学科研究也都是亮点。

李先生也指出了两周考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包括东周时期区系类型研究体系的建设还比较薄弱，建设中国古史体系方面的不足，个案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不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方面的不足，以及重墓葬、轻遗址发掘和研究的问题和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李先生认为，应通过整合研究力量、跨省区合作研究、突出课题意识和提倡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等途径，进行改进和发展。

会议代表分成“历史与文化”和“考古与器物”两组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刘绪、杨育彬、李宏等先生就河南琉璃阁大墓的年代和墓主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陈昭容女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披露了近年整理山彪镇1号大墓铜器时对两件铜戈铭文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故宫博物院刘雨先生系统研究了历代出土的两周曹国铜器铭文，从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曹国的世系；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以南阳新出“彭无所簋”的考证为中心，深入探讨了春秋时期申国与楚国的关系；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先生以山西绛县新近发现的西周晋国匭氏墓地1、2号墓出土铜器为线索，深入分析了“怀姓九宗”等鬼方族人华夏化的问题。王青教授以“山东北部沿海先秦时期的海岸变迁与海盐生产”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山东大学近年来在山东北部沿海所作的环境考古工作，并在会议期间与各位代表作了充分交流。

会议期间，代表们出席了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庆典暨“国家宝藏展”开幕式，并参观了洛阳、安阳的文物古迹和考古文博机构。（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王青教授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2007年11月,王青教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05年,王青率领山东大学部分考古学生参加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鹤壁刘庄先商墓地的考古发掘,一同参加工作的还有郑州大学考古系师生,三家单位联合作战,共同完成了这次大规模发掘工作。该遗址获得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鉴于此次考古发掘的高质量,国家文物局于近日对三家单位参加发掘的责任人分别颁发了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田野考古奖是我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最高奖励,每两年评审一次,用以奖励和促进考古发掘质量的提高。此次获奖是我校考古专业教师近二十年来再次获得这一国家级奖项。(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栾丰实教授参加“环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时期古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7年12月15日—16日,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环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时期古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市及江阴市举行,来自北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等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和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马家浜文化是目前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近年来,南京博物院在太湖西北部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发掘了溧阳神墩、宜兴骆驼墩和西溪、江阴祁头山和无锡彭祖墩等遗址,揭露了一批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种情况与以前传统认识中的太湖东部地区以圜底釜为特征的马家浜文化有较大差异。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这类遗存的分布、年代和文化性质等问题。

15日上午,南京博物院张敏、林留根、陆建方和田名利等先生首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祁头山等遗址的发掘收获,下午在常州市博物馆观看了这些遗址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并初步交流了意见。16日上午与会代表参观了江阴高城墩和祁头山遗址,下午在江阴市博物馆展开讨论,本次会议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祁头山一类遗存的年代、性质问题;二,此类遗存能否划分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三,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与会代表从这批材料的年代、性质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都赞同太湖西北部这类新遗存和东部是存在差异的,但在具体年代、性质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长期以来,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把重心放在良渚文化的墓葬和玉器上,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加深了我们对马家浜文化的认识,尤其是以往工作比较薄弱的环太湖西北部地区,这对于推动今后的考古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夏伙根、张小雷)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本刊为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不定期刊物，旨在反映近期国内外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刊载与此相关的发掘快讯、研究动态及相关论文摘要，以便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一、征稿内容

本刊设置中心动态、学术研究、田野简讯、读书评论四个栏目。具体内容涉及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聚落形态演化、古环境与气候变迁、人类生业模式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等方面。

二、来稿要求

1.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单位、地址、邮编、电话、职称(职务)、研究方向。
2. 论文、简报一般不超过 3 千字，书评 1 千字以内。请同时提交英文题目及 200 字左右的英文摘要。
3. 来稿请附电子版，或直接用电子邮件投稿。
4. 稿件一经发表，赠本刊一份以代薄酬。

三、通讯地址和咨询电话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250100

电话：0531—88362904/88366149

传真：0531—88565268

电子信箱：arc@sdu.edu.cn

网址：www.arc.sdu.edu.cn

Newsletter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Research

Volume 9, Dec. 2007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chaeology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27 Shanda Nanlu

Jinan, 250100

China.

Tel: 86-531-88362904/88366149

Fax: 86-531-88565268

Email: arc@sdu.edu.cn